

# 註釋

07.

## 引言

- (1) 保·麥蒂克(PAUL MATTICK), 《馬克思與凱恩斯: 混合經濟的局限》(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倫敦, 1980)。
- (2) 第一個提出“歷史終結”論調為美國國務院的法·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 載《國民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年夏) 顯然, “歷史終結”不外是“意識形態終結”的新版本。
- (3) 嚴家其, 《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世紀》, 載《民主中國》, 第二期(1990年6月), 頁 31-36。
- (4) 陳奎德, 《新“太陽城”的殞落——兼論世紀末的左派鄉愁》, 載《民主中國》, 第七期(1991年11月), 頁 37-40。
- (5) 《當今馬克思主義》, 1990年1月號, 頁37。
- (6) 《新左翼評論》, 180期(1990), 頁18。

## 第一章

- (1) 東·基里夫(TONY CLIFF), 《俄國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倫敦, 1988) (1948年初版以《斯大林主義俄國的性質》(THE NATURE OF STALINIST RUSSIA為書名); 安·卡路(ANTONIO CARLO), 《蘇聯的社會經濟性質》(“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載《戴羅斯》(TELOS)第21期(1974); 紅潮(劉榮錦), 《現行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 一個政治經濟的分析》, 載《共產主義綱領界說二篇》(香港, 1987); 等。
- (2) 例如, 第四國際的“墮落工人國家”論認為, 官僚層僅構成一個寄生階層, 不構成一個可以進行自我再生產的階級。

- (3) 溫輝，《東歐探索》(香港，1988)。
- (4) 溫輝，《論東歐變局》，載《爭鳴》，146期(1989年12月)至147期(1990年1月)，及《東歐革命與中蘇》，載《爭鳴》，147期。
- (5) 《爭鳴》，147期，頁43。
- (6) 《爭鳴》，146期，頁78。
- (7) 同註5。
- (8) 同註6。
- (9) 《爭鳴》，146期，頁80。
- (10) 同上註。
- (11) 《爭鳴》，147期，頁45。
- (12) 同上註，頁49。
- (13) 《爭鳴》，146期，頁80。
- (14) 《爭鳴》，147期，頁46。
- (15) 同上註，頁44。
- (16) 同註14，頁45。
- (17) 同上註。
- (18) 同註16。
- (19) 同註16。
- (20) 同註16。
- (21) 《爭鳴》，146期，頁79。
- (22) 香港英文《虎報》，1990年3月7日。
- (23) 1988年4月9日號。
- (24) 夏雅爾(P.G.HARE)及溫里斯(P.T.WANLESS)，《波蘭與匈牙利經濟改革——一個比較》(“POLISH &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 A COMPARISON”)，載《蘇維埃研究》(SOVIET STUDIES)，第33卷第4期(1981年10月)，頁492。
- (25) 基撒(M.C.KASER) (編者)，《東歐經濟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一卷(倫敦，1986)。
- (26) 同上註，頁8，轉引自基·夏雅文(CHRIS HARMAN)，《風暴突發》(“THE STORM BREAKS”)，載《國際社會主

義》季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46期(1990年春)頁31-32。

- (27) 同註25, 轉引自夏雅文, 同, 頁32。一些論者認為, 東歐的經濟增長, 以犧牲人民的消費為代價。當然, 所有落後或較為落後的國家, 不論其經濟制度, 都受到提高資本積累率的壓力。但這不一定表示人民的消費水平不能有所上升。以波蘭為例: “國民收入(淨物質生產, 以不變價格計算)以可人的速率增長——最低限度相對於英國而言。從1966至1970, 年均增長率約為6%, 1971至1975更佳, 年均率幾達10%……國民收入中的消費比例相應有所下降, 但……加快的增長令消費總額在1970至1975期間上漲約五成……生活水準看來繼續有所上升。直到1970的五年間, 實質工資年均增長約為2%, 1971至75期間, 猛升至高於7%……。”(夏雅爾及溫里斯, 同)可見, 即使在波蘭於1971-1975的五年計劃開始向外大幅舉債之前, 人民的實質生活水準仍是有所提升的。又如東歐最貧窮的羅馬尼亞, 它1951-55、1971-75及1976-80的一五、五五及六五計劃期間, 投資佔國民收入比率先後為17.6%、34.1%及36.3%, 但與此同時, 人民1951-80的實質收入年均增長率達5.3%。(以上見米·沙菲亞(M. SHAFIR), 《羅馬尼亞: 政治、經濟及社會》(ROMANI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倫敦, 1985), 頁107-8)流行的偏見認為共產黨向來沒有使東歐人民物質生活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 不是基於無知便是刻意撒謊。本文後面對蘇聯及東歐各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經濟情況有詳細論述。1992年2月增補: 另一個流行的講法是東歐只顧追求增產的政策使它成為生態災區。但據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教授哥·曉仕(GORDON HUGHES)最近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 以上僅為特殊個案的報導所給予人們的錯覺。一般而論, 東歐的環境指標符合歐共體的要求, 比西歐先進國家以前處於相等發展階段時的情況相差不遠。(見《經濟學人》, 1992年2月

1日號,頁51)

- (28) 同註25, 頁9, 見夏雅文, 同, 頁32。
- (29) 有關蘇東各國的國民收入, 有多個差別頗大的不同估計。本文引用的數字, 是《經濟學人》根據十個不同估計計算出的平均數。見《經濟學人》, 1990年3月10日號, 頁71。
- (30) 馬·梅恩 (MARTIN MYANT), 《捷克經濟 1948-1988》(THE CZECHOSLOVAK ECONOMY 1948-1988)(劍橋大學出版社, 1989), 頁2。梅恩的數據引用自基撒, 同。
- (31) 事實上, 除波、匈外, 東歐其他各國事變基本上為國外形勢突變引發的多米諾骨牌作用所產生。筆者希望在這裡指出, 即使省去國外形勢這個因素, 單著眼於國內事態發展, 除了波蘭外, 溫的經濟危機-(引發)→人民與政權間的政治矛盾加深-(引發)→民運浪潮公式也不適用。東德情況較為特殊, 因為國內變局最先緣於1989年5月2日, 匈牙利清除與奧地利接壤的邊界的鐵絲網, 導致大量東德技術工人取道匈、奧逃往西德。是時, 東德國內未有出現民運。
- (32) 筆者以“觀察”及“事實”的科學意義運用這兩個術語。這裡所指的, 當然是科學分析與實證主義的問題。
- (33) 《爭鳴》, 147期, 頁46。
- (34) 《經濟學文獻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第24期(1986年12月), 頁1687-1737。
- (35) 同上註, 頁1734。
- (3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頁83。
- (37) 溫輝, 《出路唯民主社會主義》, 載《爭鳴》, 146期, 頁3。
- (38) 大衛·柯斯特(DAVID OST), 《團結工會的轉化及中歐的前景》(“THE TRANSFORMATION OF SOLIDARITY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EUROPE”), 載《戴羅斯》, 1989年春季號, 頁79。

- (39) 《爭鳴》，146期，頁81。
- (40) 《爭鳴》，146期，頁48。
- (41) 同上註，頁49。
- (42) 柯斯特，同，頁92。
- (43) 《爭鳴》，147期，頁52。
- (44) 請參閱劉榮錦，《八九民運初步總結與前瞻》，載《四五行動——評論》，創刊號（香港1989年11月），頁28。
- (45) 《明報》，1990年1月29日。
- (46) 《明報》，1990年2月1日。
- (47) 同註45。
- (48) 同註45。
- (49) 同註46。
- (50) 同註46。
- (51) 同註45。
- (52) 同註45。
- (53) 《明報》，1990年2月2日。
- (54) 同註45。
- (55) 同註45。
- (56) 《明報》，1990年1月31日。
- (57) 同上註。
- (58) 《明報》，1990年1月30日。
- (59) 同註56。
- (60) 同註46。
- (61) 溫輝提出：“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一般東歐國家共產黨的保守派頭頭，會和平地交出權力？”（《爭鳴》，147期，頁46）留意：溫輝所講的是保守派交出權力（給改革派），與筆者所指的統治階級放棄其統治有所不同。
- (62) 轉引自台灣《聯合報》，1989年12月30日。
- (63) 台灣《中國時報》，1990年1月1日，轉引自盧斯蒙（香港中國新聞記者兼評論員），《流亡運動的歧路》，載《天安門評論》，第一卷第一期（1990年8月，香港天大出版），頁107。

- (64) 《中國時報》，1990年2月9日，轉引自盧斯蒙，同。
- (65) 《聯合報》，1990年2月15日。
- (66) 同註62。
- (67) 《聯合報》，1990年1月1日。
- (68) 同上註。
- (69) 同註65。
- (70) 《中國時報》，1989年12月30日。
- (71) 同註62。
- (72) 《中國之春》，1990年5月總84期。
- (73) 同上註，頁46。
- (74) 同上註。
- (75) 《蘇聯：莫斯科聳起民主牆》，《中國之春》，1990年5月總84期，頁49。
- (76) 同註73。
- (77) 斯·史墨格 (CYRIL SMUGA)，《政權躍入漆黑中》(“REGIME TAKES A LEAP INTO THE DARK”)，載《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此為第四國際機關雙週刊)，1989年5月15日總163期，頁5。
- (78) 同註73。
- (79) 《中國之春》，1990年5月總84期，頁62。
- (80) 由於本章寫於楊漫克《東歐創世記——採訪評論集》(香港，1991)出版之前，故沒有就楊發表於該書的其他論點作出評析。

## 第二章

- (1) 《經濟學人》，1990年11月24日號。
- (2) 《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大難臨頭，出路何在？》等。
- (3) 《1957年11月布爾格萊德演講》，轉引自基撒，同，頁15。
- (4) 當然，這些成就有很大代價。但不要忘記，西方資本主義建立時期的歷史，同樣是以火和血寫成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廿四章《所謂原始累積》) 斯大林把英國

幾個世紀的發展，壓縮在不到十五年內完成，自然也把原始積累的殘酷性濃縮地顯露出來。恩格斯上一世紀已經預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表現出不能不令人佩服的歷史遠見：“由於俄國是被資本主義大規模工業征服的最後一個國家（筆者按：當以歐洲而言），而它同時又擁有那麼多農村人口……經濟革命所帶來的革命性改變將較其他國家來得深刻及尖銳。這個過程……只能在可怕的苦難及震盪中、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完成。”（致丹尼爾遜的書信，轉引自羅斯多爾斯基（ROSDOLSKY），《資本論的創作過程》（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第2卷（倫敦，1989），頁463-4）

- (5) 基撒，同，頁19。
- (6)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頁95-96；《哥達綱領批判》，載《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頁8-13；劉榮錦，1987，第3節《什麼是社會主義？》。
- (7) 劉榮錦，1987，頁53-57。
- (8) 同上註。
- (9) 必須指出，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的高效益作用，是指在資本主義而言。由於市場價格其實是偏離價值的生產價格（《資本論》第3卷第2篇），只不過這種偏離是有系統性的，所以，資源配置其實同樣有不符真正效益的偏差，只不過這種偏差沒有在市場顯現出來，換句話，是隱藏著的。再者，這種效益以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為前提（分配關係決定各類產品的需求），因此含有階級性質，絕非所謂客觀或屬於自然規律的效益。
- (10) 科爾奈，《短缺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亞姆斯特丹，1980）。另一些被稱作“失衡學派”（DIS-EQUILIBRIUM SCHOOL）的學者對科爾奈的結論不表贊同。近月來（現為1991年2月底），中國老牌經濟學家薛暮橋亦幾番提出，中國近兩年的市場疲軟顯示短缺不一定是定律，生產過剩同樣可以出現。
- (11) 劉榮錦，1987，頁96-100。

- (12)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駱耕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價值問題》（科學出版社，1957）；王思華，《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幾個問題的一些看法》，載《經濟研究》，1959年第1期；等。
- (13) 根據經濟互助會議(CMEA)官方數字，經互會成員國對西方貿易佔總貿易比例，從1960年20.6%增加到1975年30.3%。（尼·列亞什(REZSO NYERS——匈牙利1968年“經改之父”），《匈牙利經濟改革與政策之間的關係》（“INTERRELATIONS BETWEEN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載《比較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第7期（1983），頁213）就匈牙利而言，可兌換貨幣進口佔總入口比率從1968年31.3%增加到1974年50.6%，出口由28.7%升至44.2%。（保·馬勒（P. MARER），《匈牙利外貿機制及表現，1968-1979》（“THE MECHANISM & PERFORMANCE OF HUNGARY'S FOREIGN TRADE, 1968-1979”），載夏雅爾、雷達斯及史雲（P. G. HARE, H.K. RADICE & N. SWAIN）（編），《匈牙利：經濟改革十年》（HUNGARY :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倫敦，1981），頁180）波蘭對西方貿易佔外貿總額百分率從1970年三分之一增至1975年近50%。（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492）
- (14) 以1973年數字為例，匈牙利外貿總值相等於淨物質生產86.6%。（夏雅爾，《匈牙利工業價格》（“INDUSTRIAL PRICES IN HUNGARY”）下篇，載《蘇維埃研究》，第28卷第3期（1976年7月），頁377）1968、1970、1975、及1980，出口總值順序相等於淨物質生產26.4%、39.2%、44.7%、及52.7%。（列亞什，同，頁219）保加利亞貿易佔國民收入比率比匈牙利更高，但經互會貿易佔總貿易約八成，故情況不能與匈牙利相提並論（詳見第十八章）。
- (15) 落後或較落後國家的工人運動往往面對一個矛盾的局面



。世界經濟一日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操縱，鬥爭往往令國家更加陷入經濟困局。筆者指出這點的意思，當然不是認為這些國家的工人不應該進行鬥爭。但這是一個與本文無關的問題。

- (16) 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 492-493。

### 第三章

- (1) 根據匈牙利經濟學家伊·基巴(ISTVAN GABOR)界定，第二經濟包括註冊私營部門及沒有註冊的其他私營經濟活動。(基巴，《第二經濟》(“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載ACTA OECONOMICA，第22卷(3-4)(1979)，頁291-311)
- (2) 這控制權可以是直接的(如企業主管)，也可以是間接的(如有關經濟活動的行政審批權)。
- (3) 這是指一般而言，並不排除企業對個別改革措施會加以反對。例如，把大企業分解成多個規模較小的企業，以減低壟斷性，顯然不會受到大企業歡迎。
- (4) 厲以寧，《改革國家資產管理制度的建議》，載香港《經濟日報》，1989年2月13、14日。
- (5) 例如，中國1988年開始治理整頓以來，中央一直企圖向地方、企業(尤其是地方)收權，但始終沒有什麼成效。顯然，這個集團的發展已達一定成熟及鞏固程度。
- (6) 一些人可能不同意筆者用“階級”一辭來形容這個利益集團。應當承認，它是剛新興起的，它能否得到穩定的發展還有待時間考驗。但如註5指出，當它的發展達一定成熟階段，它有一定的穩固性。換句話，它在社會生產關係中有獨立於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實質存在及位置。再者，東歐事變後的情況顯示，它的階級地位正在得到市場機制保障(這點本文後面會論及)，而沒有因事變而喪失。另方面，新興幹部階級興起的情況，有別於以前統治階級(傳統官僚資本階級和依附於它的黨政企幹部)的內部利益分化。在傳統蘇聯模式底下，統治階級

內部不同集團之間也會出現利益矛盾（例如，產業部門爭奪資源）。但各個集團的階級地位都建基於同一種社會生產關係上。市場化的經改在斯大林模式的生產關係中引入市場經濟的生產關係。跟傳統官僚資本階級不同，新興幹部階級的階級基礎逐步從前一種生產關係轉到後一種。基於這個因素，當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達到一定成熟程度，它的性質已超越於蘇聯模式底下存在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集團的界限，而具有雛形階級的性質。

- (7) 這是因為斯大林模式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與東歐小國不同（尤其是像匈牙利那般缺乏資源），中國國力遠較雄厚，但到七十年代末葉，終於也頂不住改革的壓力。這為鄧小平東山再起提供了客觀基礎。其實，中國的改革壓力與東歐有所不同，這點本文後面會作出論述。
- (8) 筆者這一個見解取材自謝·達爾考科斯基(JACEK TARKOWSKI)，《波蘭和蘇聯新與舊的貪污形態》（“OLD AND NEW PATTERNS OF CORRUPTION IN POLAND AND THE USSR”），載《戴羅斯》，1989年夏季號。
- (9) 筆者並非指抽象的國際大氣候，而是一些實際及具體的客觀因素，如石油危機對匈牙利的打擊等。
- (10) 準確地說，個體戶及民營小合作社不應歸納在“民營資產階級”這個範疇。
- (11) 1989年，中國鄉鎮企業總產值超過7,530億，佔全國總產值近25%。1990年，鄉鎮企業職工達9,400萬，約佔農村剩餘勞動力50%。（以上見《文匯報》，1990年9月27日）一些論者把鄉鎮企業一概歸納於民營經濟（例如，萬潤南載香港《信報》，1989年8月12日的講話），這是不正確的。鄉鎮企業非一個所有制範疇。它包括社隊企業、鄉或鎮政府辦的企業、民辦企業等。但由於官方統計沒有分類，故無從稽考其中民辦企業的正確比重，但據悉，除了在一些如溫州的個別地方外，一般都很低（見曉亮，《中國所有制結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05）。

- (12) 趙紫陽派在中國八九民運中便面對這種矛盾情況。(見劉榮錦,《評“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及朝野良性互動論,兼論八九民運的失敗及策略得失》第10節,載《四五行動——評論》,第3期(香港,1991年3月10日),頁32-36)
- (13) 中國八九民運期間,趙紫陽派和黨外代表民營企業家階級的政治力量最終分道揚鑣。見劉榮錦,1991,頁32-36。

#### 第四章

- (1) 以上見夏雅爾,《匈牙利工業價格》上篇,載《蘇維埃研究》,第28卷第2期(1976年4月),頁193-194。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出處相同。
- (2) 1963年的托拉斯運動使匈牙利工商業變成高度集約化。見科爾奈,1986,頁1698-99。
- (3) 根據馬勒,這三類再細分為六種:固定價、最高限價、最低限價、上下限浮動價、導向價、及自由價。(馬勒,同,頁168)
- (4) 彼·巴拉沙(BELA BALASSA),《改革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REFORMING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載《比較經濟學期刊》,第7期(1983),頁259-260。
- (5) 夏雅爾,1976b,頁363。以下有關資料,除特別註明外,出處相同。就中國經濟學者的有關爭論,見《經濟學研究》、《經濟學動態》編輯部(編),《建國以來政治經濟學重要問題爭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1)。
- (6) 馬勒,同,頁196;夏雅爾,《匈牙利體制改革的開始》(“THE BEGINNING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HUNGARY”),載《蘇維埃研究》,第35卷第3期(1983年7月),頁317。
- (7) 以上見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508;巴拉沙,同,頁225-260;夏雅爾,1983,頁317-318;恩·亞當(JAN ADAM),

《匈牙利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80'S”), 載《蘇維埃研究》, 第39卷第4期(1987年10月), 頁618-620; 夏雅爾、雷達斯、史雲, 同, 頁21及67。

- (8) 以上資料見亞當, 同。
- (9) 史雲, 《八十年代初的匈牙利農業: 緊縮後改革》(“HUNGARIAN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1980'S: RETRENCHMENT FOLLOWED BY REFORM”), 載《蘇維埃研究》, 第39卷第1期(1987年1月), 頁24。
- (10) 夏雅爾, 1976及1983; 里切(X. RICHET), 《匈牙利計劃模式是否存在?》(“IS THERE AN HUNGARIAN MODEL OF PLANNING?”), 載夏雅爾、雷達斯、史雲, 同, 頁23-27; 米·馬里斯(M. MARRESE), 《匈牙利工資管制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WAGE REGULATION IN HUNGARY”), 載夏雅爾、雷達斯、史雲, 同, 頁54-80; 譚·鮑威爾(TAMAS BAUER), 《匈牙利新經濟機制下企業的矛盾位置》(“THE CONTRADICTIONA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NEW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載《東歐經濟學》(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第15卷第1期(1976)。以下資料, 除特別註明外, 出處相同。
- (11) 馬勒, 同, 頁178。
- (12) 馬里斯, 1981, 頁77。
- (13) 馬·達多斯(M. TARDOS), 《貨幣的角色: 匈牙利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係》(“THE ROLE OF MONE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ERPRISES IN HUNGARY”), 載ACTA Oeconomica, 第25卷第1-2期(1980), 頁24。
- (14) 這些改動的用意顯然在於節約勞動力。
- (15) 巴拉沙, 同, 頁255。
- (16) 鮑威爾, 1976, 頁6; 夏雅爾及溫里斯, 同, 頁508; 馬里斯, 1981, 頁67-68。

- (17) 夏雅爾及溫里斯,同;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頁21。
- (18) 亞當,同,頁614。
- (19) 史雲,1987,頁33。
- (20) 以上資料見亞當,同,頁614-615及621。
- (21) 夏雅爾, 1976b,頁367。
- (22) 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頁15。
- (23) 同上註。
- (24) 馬里斯,1981,頁90。
- (25) 科爾奈,1986,頁1712。
- (26) 同上註, 頁1696。
- (27) 同註25,頁1711。
- (28) 史雲,1987,頁29。
- (29) 馬里斯,1981,頁100。
- (30) 夏雅爾,1981,頁90。
- (31) 同上註。
- (32) 巴拉沙,同,頁267。
- (33) 同註30。
- (34) 同註32。
- (35) 同註30。
- (36) 馬里斯,1981,頁100。
- (37) 巴拉沙,同,頁269-270所引財政部長的說話。
- (38) 以上資料見馬里斯,1981,頁100;巴拉沙,同, 頁268-269 ;科爾奈,1986,頁1712。
- (39) 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夏雅爾,1983, 頁325-327 ;科爾奈,《對匈牙利經濟改革現狀及前景的評價》(“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 THE PROSPECT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載《比較經濟學期刊》,第7期(1983), 頁235;達多斯,《匈牙利小企業愈加重要的角色及所受到的矛盾對待》(“THE INCREASING ROLE AND AMBIVALENT RECEP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HUNGARY”),載《比較經濟學期刊》,第7期(1983), 頁283。

- (40) 巴拉沙,同,頁273。
- (41) 勒基(T.LAKY),《匈牙利小企業:神話與現實》(“SMALL ENTERPRISES IN HUNGARY: MYTH AND REALITY”),載 ACTA OECONOMICA, 第32卷第1-2期(1984),頁43。
- (42) 亞當,同,頁621。
- (43) 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亞當,同,頁612-614及621。
- (44) 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頁32。
- (45) 議會制度其實只適用於大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另一種“集體管理”制度。就與政府的關係而言,兩種制度大同小異,故本文把“集體管理”省略。
- (46) 夏雅爾,1983,頁321。
- (47) 史雲,1987,頁34。
- (48) 史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程陷於危機》(“HUNGARY'S SOCIALIST PROJECT IN CRISIS”),載《新左翼評論》174期(1989),頁13。
- (49) 夏雅爾,1976b,頁374。
- (50) 同上註,頁389,註124。
- (51) 夏雅爾,1983,頁318及史雲,1987,頁34。
- (52) 亞當,同,頁611;史雲,1987,頁34;史雲,1989,頁14。
- (53) 鮑威爾,《匈牙利模式》(“THE HUNGARIAN ALTERNATIVE TO SOVIET-TYPE PLANNING”),載《比較經濟學期刊》,第7期(1983),頁310。
- (54) 以下資料見馬里斯,1981;基巴及格拉西(P.GALASI),《匈牙利自1968年的勞動市場》(“THE LABOUR MARKET IN HUNGARY SINCE 1968”),載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亞當,同。
- (55) 以上見史雲,1989,頁13;《世界馬克思主義評論》(WORLD MARXIST REVIEW,此為多個國家執政共產黨的合刊,現已停刊),1989年3月號。
- (56) 以下資料,見科爾奈,1986,頁1703-4;達多斯,1983,頁284;夏雅爾,1983,頁326;史達克(D.STARK),《企業的微觀政治及改革的宏觀政治:匈牙利企業車間討價還價

的新形式》(“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FIRM AND THE MACROPOLITICS OF REFORM: NEW FORMS OF WORKPLACE BARGAINING IN HUNGARIAN ENTERPRISES”)載《世界體制中國家與市場的對抗》(STATE VS MARKET IN THE WORLD SYSTEM)(加里福尼亞,1985),頁257;勒基,同,頁43。

- (57) 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馬勒,同。
- (58) 亞當,同,頁622。
- (59) 巴拉沙,同,頁273。
- (60) 同註58。
- (61) 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夏雅爾,1983,頁320-321。
- (62) 對照下,中國至今仍設有航空航天工業部、機械電子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紡織工業部、建築材料工業部等。
- (63) 夏雅爾,1983,頁328,註8。
- (64) 同上註,頁322-323。
- (65) 同註63,頁324。
- (66) 亞當,同,頁622-623。
- (67) 科爾奈,1983,頁235。
- (68) 科爾奈,1986,頁1699。
- (69) 馬勒,同,頁163。
- (70) 同上註。
- (71) 以上資料見亞當,同,頁620;科爾奈,1986,頁1711-12;《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頁96。
- (72) 1985年,企業純收入中國家財政佔85%,企業僅佔15%。見科洛斯史斯格拿(K. FALUS-SZIKRA),《匈牙利第一及第二經濟工資及收入的差距》(“WAGE AND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ECONOMIES IN HUNGARY”),載ACTA OECONOMICA,第36卷第1-2期(1986),頁99。
- (73) 史雲,1987,頁29。
- (74) 科爾奈,1986,頁1712,表7。
- (75) 同上註,頁1713。

- (76) 同註74,頁1708。
- (77) 達多斯,1983,頁279。
- (78) 史雲,1989,頁13;《南華早報》,1990年6月23日。
- (79) 馬里斯,1983,頁331-332;撒·沙基(CSABA CSAKI),《匈牙利農業結構及管理》(“ECONOMIC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HUNGARIAN AGRICULTURE”),載《比較經濟學期刊》第7期(1983),頁318-9。
- (80) 史雲,1987,頁27。
- (81) 馬里斯,1983,頁333。
- (82) 科爾奈,1986,頁1702。
- (83) 同上註,頁1701。
- (84) 馬里斯,1983,頁334,表1。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同。
- (85) 同註82。
- (86) 同註82。
- (87) 史雲,《1967年以來匈牙利農業體制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HUNGARY'S AGRICULTURAL SYSTEM SINCE 1967”),載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頁248,註1。
- (88) 沙基,同,頁320-321。
- (89) 史雲,1981,頁233。
- (90) 同註82。
- (91) 同註82。
- (92) 史雲,1987,頁28;科爾奈,1986,頁1702。
- (93) 沙基,同,頁320。
- (94) 史雲,1981,頁235。
- (95) 同上註,頁233。
- (96) 同註94,頁245。
- (97) 史雲,1987,頁28。
- (98) 同上註,頁31。
- (99) 沙基,同,頁325。
- (100) 達多斯,1983,頁278。
- (101) 史雲,1987,頁29。



- (102) 這些是由國營農場和合作社合辦的組織。主要功用為提供技術諮詢及生產服務。詳見史雲,1981,頁236-240。
- (103) 同註101。
- (104) 同註101,頁32。
- (105) 同註101,頁33。
- (106) 同註99。
- (107) 同註99。
- (108) 史雲,1987,頁30。根據科爾奈(1986,頁1702)引用的另一個資料來源,合作社1984年總產值中有34%來自鄉鎮企業。
- (109) 以上定義大致依循匈牙利研究第二經濟的首席權威基巴的界定方法。見第三章,註1。
- (110) 科爾奈,1986,頁1705。
- (111) 達多斯,1983,頁279。
- (112) 科爾奈,1986,頁1704。
- (113) 非法私營部門活動與黑市外匯、回扣等非生產性違法活動是分開的。一些中國經濟學者把二者一併歸納在“地下經濟”範疇。
- (114) 自1968年,匈牙利容許私人擁有房地產。此後,私人建屋逐漸成為主導。以1979年為例,新落成住宅中42%屬於私房。1984年比率上升至85.7%。1980年全部房屋中71.4%為私房。(以上見科爾奈,1986,頁1708)雖然政府容許私人建屋,對於房地產買賣則嚴加管制。(同,頁1713)文中所指是為逃避苛稅的非法私人買賣。
- (115) 達多斯,1983,頁279。按:盜竊國家物資、貪污等不屬於經濟範疇之內的活動不包括在內。
- (116) 勒基,同。以下資料,除特別註明外,出處相同。
- (117) 達多斯(1983,頁284)說上限人數為三十人。相信這是與下述關於GMK的規定發生混淆。
- (118) 如前所述,自1982年,國家批准、鼓勵成立小集體企業。
- (119) 馬里斯,1981,頁58。
- (120) 除勒基,同,外,另見史達克,同。

- (121) 如前所述，1985年前政府仍對全部企業實行工資管制。由於過時「津貼」包括在工資總額內，成立VGMK與本企业簽訂合同，不外是把實際上屬於「津貼」的工資變為開支。
- (122) 科爾奈，1986，頁1709。
- (123) 達多斯，1983，頁283及285-6。
- (124) 史達克，同，頁257。
- (125) 科爾奈，1983，頁240。
- (126) 同註122。
- (127) 詳見達多斯，1983，頁281及285。
- (128) 以上見達多斯，1983，頁284-5；勒基，同，頁48。
- (129) 同註124。
- (130) 勒基，同，頁43，表1。
- (131) 勒基，同，頁57。
- (132) 例如，不少人擁有渡假屋、遊艇等。私家車數目從1966年到1984年激增13.7倍。(科爾奈，1986，頁1708)八十年代初，三分一客量運輸依靠私家車。(科爾奈，1983，頁238)
- (133) 勒基，同，頁46。
- (134) 即使辦理註冊，中國亦出現名為集體，實乃私營的情況。
- (135) 這數字按表 4.7綜合達多斯和科爾奈的數字計算出來。
- (136) 勒基，同，頁44。
- (137) 科爾奈，1986，頁1708。
- (138) 同上註，頁1709。
- (139) 同註137，頁1705；達多斯，1983，頁281。
- (140) 勒基，同，頁57。
- (141) 勒基，同，頁48。
- (142) 雷達斯，《匈牙利與西方的工業合作》(“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HUNGARY AND THE WEST”)，載夏雅爾、雷達斯，史雲，同，頁114。
- (143) 同上註，頁110。
- (144) 同註142，頁110及126。

## 第五章

- (1) 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494。
- (2) 馬勒,同,頁183。
- (3) 同上註。
- (4) 同註2,頁180。
- (5) 同註2,頁181。
- (6) 根據史雲(1989,頁15)所引用的數字,1974及1979兩年,可兌換貨幣外債先後為 31.05億及83億,比表5.2的數字為高,理由是表5.2數字按不變價格計。根據伊·史洛基斯蒂( ILIANA ZLOCH-CHRISTY),《東歐債務問題》(DEBT PROBLEMS OF EASTERN EUROPE)(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頁34,表2.4,匈牙利1974年至1979年這五年可兌換貨幣外債順序為23億;32億;54億;73億及80億。
- (7) 同註2,頁184。
- (8) 同註2,頁184-5。
- (9) 同註2,頁186。
- (10) 雷達斯,同,頁129。
- (11) 同註2,頁190-1。
- (12) 同註2,頁191。
- (13) 史雲,1989,頁15。
- (14) 科爾奈,1986,頁1721。
- (15) 列亞什(同,頁220)持有類似看法。
- (16) 同註14。
- (17) 這個數字根據史雲,1989,頁15。
- (18) 亞當,同,頁625。
- (19) 同註13。
- (20) 拉·柯班(LASZLO URBAN),《過渡期中的匈牙利:反對黨的冒起》(“HUNGARY IN TRANSITION: THE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ARTIES”),載《戴羅斯》,1989年春季號,頁110。
- (21) 史雲,1989,頁15;亞當,同,頁625。
- (22) 同註20。

- (23) 史雲, 1989, 頁15; 《經濟學人》, 1991年3月2日號。按史洛基斯蒂, 同, 頁50, 表2.11, 1980-85年的數字順序為90.9億; 87億; 77.2億; 82.5億; 89億及112.6億。
- (24) 每年中期及長期債項還本付息除以出口外匯收入(英文為DEBT SERVICE RATIO)。
- (25) 同註13。按史洛基斯蒂, 同, 頁64, 表2.16, 1982-85年的數字順序為40%; 36%; 34%; 50%; 70%。
- (26) 同上註。根據《經濟學人》, 1991年3月2日號引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數字, 1985的比率稍低於60%。
- (27) 同註13。

## 第六章

- (1) 伊·巴蘭特(IVAN BEREND), 《匈牙利經濟改革, 1953-1988》(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1953-1988)(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0), 頁213。
- (2) 轉引自夏雅爾, 1976b, 頁390。
- (3) 以下有關資料見巴蘭特, 同, 頁201-13; 夏雅爾、雷達斯、史雲, 同, 頁15。
- (4) 科爾奈, 1986, 頁1713。
- (5) 同上註, 頁1693。

## 第七章

- (1) 以上分析與尼·普蘭薩(N. POULANTZAS)的論點有相近的地方。見普蘭薩, 《資產階級國家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載烏列(J. URRY)及域福特(J. WAKEFORD)(編), 《北列顛的權力格局》(POWER IN BRITAIN)(倫敦, 1973); 和《資產階級國家: 回應米里班和力格柳》(“THE CAPITALIST STATE: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載《新左翼評論》, 1976年1月-2月號。但必須指出, 普蘭薩過份強調了國家(管治集團)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而忽略管治集團與統治階級之間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利益，乃至人事關係。詳見夏雅文，《當今國家與資本主義》(“THE STATE AND CAPITALISM TODAY”)，載《國際社會主義》51期(1991年夏)，頁3-22。

- (2) 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見他寫於廿年代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英文譯本，倫敦，1965)。
- (3) 劉榮錦，1987，頁96-98。
- (4) 有關中國改革派在八九民運扮演的角色，見劉榮錦，1989；和1991，頁32-36。
- (5) 以上見香港中通社1990年10月7日電和《文匯報》，1990年12月17日。
- (6) 科爾奈，1986，頁1712。應當留意，文中的比較有片面性。例如，匈牙利 80%房屋由私人擁有，消化了大量資金。假使中國一早推行住房改革，肯定會把儲蓄存款和債券中大部份消化。
- (7) 《文匯報》，1991年3月10日。
- (8) 文中的比較沒有把一些有關因素計算在內。首先，假使按全國勞動人口計，中國的比率會遠低於16%。但究竟如何把農民歸納是一個問題，因為農民既與民營工商業者有類似之處(如兩者都屬於個體經營)，亦有差異的地方(如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不屬於他們自己的投入)。其次，中國鄉鎮企業中私營比率無法確定。最重要的是，與匈牙利相反，中國有大量剩餘勞動力用以發展民間小經營。基於上述，根據以上比較下任何結論都要額外小心。
- (9) 《文匯報》，1990年9月27日、1991年1月14日、1991年1月15日。
- (10) 同以上情況(見註6和8)一樣，文中的比較有片面性。例如，中匈兩國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程度的差別，直接影響有關比率。
- (11) 首都鋼鐵公司，《從首鋼看承包制發展趨勢》，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8年第8期。這是八九民運前夕

的情況，之後有否改變，筆者暫時未能掌握有關資料。

- (12) 同註4。
- (13) 以下資料見《經濟學人》，1990年4月14日號，頁17-20。
- (14) 鑒於匈牙利行業的集約化程度，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根據《經濟學人》，1991年2月23日號(頁48)，1989年底，匈牙利共有14,400家企業。照推測，這數字應該包括PJT、GMK等所有形式的企業在內。
- (15) 自由民主派聯盟的鮑·沃賀斯(PAL JUHASZ)在《經濟學週報》，1989年3月30日第13期便指出，交叉控股使“管理特權階層變成最終擁有者。”(轉引自史雲，1989，頁25)
- (16) 史雲，1989，頁16。
- (17) 事實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表明，進一步市場化是提供新信貸的條件。西方國家亦明言，匈牙利需要把政制多元化以交換經援。見柯班，同，頁109。
- (18) 《南華早報》，1990年9月27日。由於上文論述的交叉控股企業的股份沒有轉到私人名下，它們名義上仍屬國營，故應該包括在文中的比率之內。關於這個比率，筆者沒有資料顯示究竟它是按什麼標準計算(產值？資產價值？企業數目？……)。筆者相信它僅為政府向傳媒發放公佈時所採用的一個粗略數字，不能視為一個準確數字。

## 第八章

- (1) 本節資料取自史雲，1989；柯班，同；及有關剪報。
- (2) 卡達爾主義與鄧小平路線頗為相近。兩者都容許民間享有經濟自由，但並不挑戰一黨專政為條件。
- (3) 轉引自《時代雜誌》，1989年2月20日號，頁18。
- (4) 《南華早報》，1989年7月4日。
- (5) 前身為第二國際。
- (6) 表面看來，晚期匈共／社會黨於變局期間和於大選後先後代表兩個對立的階級，是一個矛盾。這個表面矛盾是

一種錯覺。我們知道，社民黨／社會黨／……屬於工人動動中的改良主義者，以改良資本主義為綱領。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一再表明，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前提下，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往往使這些改良主義者屈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例如，左翼政府向工人開刀，以維持民族資本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以匈牙利八十年代下半葉面對的經濟險情，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社會黨都會以保障民族資本的穩定性和生存能力為大前提。這便避不開維護新崛起的新一代民族資產階級(即新興幹部階級)的利益。再考慮到晚期匈共／社會黨是從代表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政黨蛻變出來，它於變局期間在走向社會民主化的同時，擔當了上述角色便不難理解。它喪失政權表示它一併失去繼續扮演這個角色的機會。它在這情況下回復到典型西歐左派反對黨角色，是很順理成章的事。

## 第九章

- (1) 《南華早報》，1990年9月16日。
- (2) 《南華早報》，1990年9月27日。
- (3) 《南華早報》，1990年10月20日及《虎報》，1990年11月10日。
- (4) 同註1。
- (5) 《南華早報》，1990年10月20日。
- (6) 《經濟學人》，1991年5月11日號。
- (7) 《經濟日報》，1991年4月18日轉載《商業周刊》報導。
- (8) 《虎報》，1990年11月10日。
- (9) 同註6。

## 第十章

- (1) 波蘭1980-81年工運的資料非常豐富，但本文沒有進行詳細資料搜集，主要依靠筆者的基本認識及手頭上的一些簡單材料。關於1970-71年工運，讀者可參考 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ERES, 《波蘭：1970-71》

( POLAND:1970-71) ( 美國底特律BLACK & RED出版社, 1977)。

- (2) 見柯斯特,同,頁91。
- (3) 喬·哥蘭基艾域奇(GEORGE KOLANKIEWICZ)及保·勞易斯(PAUL G. LEWIS),《波蘭: 政治、經濟及社會》( POLAND : POLITICS, ECONOMICS & SOCIETY )(倫敦, 1988), 頁105。

## 第十一章

- (1) 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492。
- (2) 同上註。
- (3) 史洛基斯蒂,同,頁32,表2.2。
- (4) 波蘭 1971年至1977年對全球的進出口比價指數順序為(1970=100):105.1; 106.1; 104.4; 102.4; 102.8; 103.5; 102.1。對發達西方國家為(1970=100):110.7; 113.0; 107.9; 116.6; 122.4; 119.8。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197-8,表A.7和A.8。
- (5) 夏雅爾及溫里斯,同,頁493。
- (6) 以下有關1973年改革的資料,見夏雅爾及溫里斯,同。
- (7) 有關這些改革,見溫里斯,《波蘭經濟改革:1973-79》“ECONOMIC REFORM IN POLAND 1973-79”,載《蘇維埃研究》,第32卷第一期(1980年1月)。
- (8) 例如,雖然1987年實質國民生產比1978年低出10%以上(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工業能源及燃料消耗反而高於1978年。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5。
- (9) 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急轉直下,但該年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仍企於7億美圓的水平。1981年微減至5億。1982年經濟處於谷底(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低出25%),這才使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轉虧為盈。1982年至1985年四年先後錄得6億;9億;7億;及6億的盈餘。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44,表2.10。
- (10) 以下有關1982年一輪改革的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史



- 哥穆爾卡(S.GOMULKA)及耶•羅斯杜亞斯基(J. ROSTOWSKI), 《波蘭經濟體制改革: 1982-1983》(“THE REFORMED POLISH ECONOMIC SYSTEM 1982-1983”), 載《蘇維埃研究》, 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 (11) 安•布洛(ANDRZEJ BLOCH), 《波蘭私營部門》(“THE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載《戴羅斯》, 第66期(1985-86冬季號), 頁130。
- (12) 胡•奎薩(WOLFGANG QUAISSER), 《波蘭農業價格政策及私營農業》(“AGRICULTURAL PRICE POLICY AND PEASANT AGRICULTURE IN POLAND”), 載《蘇維埃研究》, 第38卷第4期(1986年10月), 頁577。
- (13) 米•戈奧力基(MIRON WOLNICKI), 《波蘭自管運動及產權問題》(“SELF-GOVERNMENT AND OWNERSHIP IN POLAND”), 載《戴羅斯》, 1989年夏季號, 頁74。
- (14)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8。
- (15)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4。
- (16) 同上註。
- (17)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0。
- (18)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1。
- (19) 同上註。
- (20)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3。
- (21)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 同, 頁116。
- (22) 由於筆者暫時無法掌握到較為詳細的具體資料, 故未能就這些改革加以論述。
- (23) 柯斯特, 同, 頁82-83。

## 第十二章

- (1) 本節資料, 除特別註明外, 見安•艾斯倫特(ANDERS ASLUND), 《波蘭私營企業的運作》(“THE FUNCTION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 載《蘇維埃研究》, 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羅斯杜亞斯基, 《波蘭社會主義的腐化及私營企業的成长》(“THE DECAY OF

SOC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 ), 載《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

- (2) 這些數字是筆者根據波蘭農村人口構成(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35)按比例計算所得。
- (3) 布洛,同,頁131。
- (4) 《國際觀點》,第163期,頁4引用官方統計年鑑的數字。
- (5) 柯斯特,同,頁82。
- (6) 見艾斯倫特,同。
- (7) 同註3。
- (8) 達爾考科斯基,同,頁59,註解21。
- (9) 見布洛,同,頁131。
- (10) 見艾斯倫特,同。
- (11) 同註3。
- (12) 艾斯倫特,同,頁434。

### 第十三章

- (1) 本節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奎薩,同;愛·谷克(EDWARD COOK),《波蘭農業改革》(“AGRICULTURAL REFORM IN 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 (2)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38。
- (3)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29。
- (4)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28-131。

### 第十四章

- (1) 本節資料,除特別註明外,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第4章。
- (2) 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28。

### 第十五章

- (1) 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

- (2) 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5。
- (3) 同註1; 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3-204。
- (4) 同註1。
- (5) 轉引自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附註26。
- (6) 同註2。
- (7) 柯斯特,同,頁89。
- (8) 夏雅文,同,頁21。
- (9) 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1,附註18。
- (10) 《國際觀點》,第156期(1989年2月6日),頁28。
- (11) 柯斯特,同,頁82,附註20; 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1;  
《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8。
- (12) 柯斯特,同,頁90,附註39; 《經濟學人》,1990年4月14  
日號,頁21。
- (13) 同上註。
- (14) 《國際觀點》,第169期(1989年9月18日),頁10。
- (15) 同上註。
- (16) 同註14。
- (17) 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
- (18) 柯斯特,同,頁90,附註39。

## 第十六章

- (1) 以上見戈奧力基,同,頁66-67。
- (2) 柯斯特,同,頁75。
- (3) 柯斯特,同,頁74。
- (4) 柯斯特,同,頁76。
- (5) 布洛,同,頁130。
- (6) 同註4。
- (7) 團結工會一大綱領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它的目標為“建立一個把計劃、自管和市場聯繫起來的新經濟秩序”。但重點在通過民主方法制訂計劃和工人自管。
- (8) 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80。
- (9) 文件刊於工會地下周報第141期。見《國際觀點》, 185

期(1990年5月21日),頁6。

- (10) 早於1982年12月,TKK號召工人該月10日進行總罷工,已經沒有得到響應。
- (11) 如前分析(第八章,註5),這兩個不同的階級屬性一併存在於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個矛盾的情況。鑒於波蘭比匈牙利更為險惡的經濟形勢,這種情況的出現更加易於理解。

## 第十七章

- (1) 雖然新集團在波蘭的發展缺乏匈牙利新興幹部階級由來已久的穩固根基,但到頭來,最終結果也大同小異。故此,為文字表達方便起見,本文同樣以“新興幹部階級”作為新集團的名稱。
- (2) 柯斯特,同,頁82。
- (3) 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
- (4) 以下有關全民投票的資料,除另加註明外,見占·麥克加力格爾(JAMES P. MCGREGOR),《經濟改革與波蘭民意》(“ECONOMIC REFORM AND POLISH PUBLIC OPINION”),載《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頁215-227。
- (5) 1987年,政府撤銷八個產業主管部門,成立統一的工業部,同時把1,800個以前直屬主管部門的企業轉交地方政府。(戈奧力基,同,頁73,附註19)這是所謂加強自治的其中一個措施。
- (6) 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1;《國際觀點》,第159期(1989年3月20日),頁10。
- (7) 同上註。
- (8) 柯斯特,同,頁81-82。
- (9) 《國際觀點》,第159期,頁11。
- (10) 柯斯特,同,頁83;《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8。
- (11)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理論權威胡平在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1990年4月、5月、6月、10月及11月

號發表長文《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論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提出一個叫做“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民運“策略原則”。筆者曾就這個“原則”及胡平對中國八九民運的評論提出詳細的批評(劉榮錦，1991)。

## 第十八章

- (1) 以上第一及第二點見柯斯特，同，頁84-85。
- (2) 柯斯特，同，頁86，附註26。
- (3) 瓦文薩派不限於把自己自封為新工會的領導。1988年秋，不少老團結分子回流。罷工工人要求以企業為單位，自下而上選舉工會代表。瓦文薩派卻強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經離開了企業的回流分子任命為企業的工會「代表」。(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9，附註36)這種任命制度與共產黨的幹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轍。無怪工人小組(見下文)把團結工會的NOMENKLATURA與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並論。
- (4) 詳見《國際觀點》，159期，頁10-11。
- (5) 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0，附註36；柯斯達，同，頁86；《國際觀點》，159期，頁12。
- (6) 柯斯特，同，頁86。
- (7) 《國際觀點》，156期，頁28；《時代雜誌》，1989年2月20日號，頁18。
- (8) 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2。
- (9) 轉引自《國際觀點》，169期，頁7。
- (10) 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0。
- (11) 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附註28。
- (12) 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5-87。
- (13) 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3。
- (14) 《時代雜誌》，1989年4月17日號；《國際觀點》，166期(1989年6月26日)，頁18。
- (15) 以上見《國際觀點》，163期，頁4。
- (16) 《國際觀點》，171期(1989年10月16日)，頁5。

- (17) 《國際觀點》，163期，頁3。  
(18) 《國際觀點》，166期，頁19。

## 第十九章

- (1) 轉引自《國際觀點》，166期，頁18。  
(2) 以上見《時代雜誌》，1989年7月31日號；頁21；《國際觀點》，169期，頁9。  
(3) 《時代雜誌》，1989年8月7日號。  
(4) 轉引自《國際觀點》，169期，頁9。  
(5) 以上見《國際觀點》，171期，頁3。  
(6) 詳見《國際觀點》，171期，頁3-5。  
(7) 此人現在又擔任蘇聯政府經濟顧問。  
(8) 內容詳見《文匯報》，1991年3月25日。  
(9) 柯斯特，同。  
(10) 《南華早報》，1990年9月23日，《老朋友現在處於天南地北的位置》（“OLD FRIENDS ARE NOW POLES APART”）。  
(11) 《國際觀點》，185期，頁4。  
(12) 《國際觀點》，185期，頁7。按：引文援引自綱領草案。筆者一時未能掌握到大會最後通過的文本。  
(13) 同上註。  
(14) 轉引自《國際觀點》，169期，頁10。  
(15) 《南華早報》，1989年9月19日。  
(16) 《南華早報》，1989年9月20日。  
(17) 《經濟學人》，1990年2月3日號，頁46。  
(18) 《南華早報》，1990年11月27日。  
(19) 《南華早報》，1990年12月23日。  
(20) 《南華早報》，1991年1月5日。

## 第廿章

- (1) 以上見《經濟學人》，1990年4月14日號，頁17-21。  
(2) 以上見《文匯報》，1991年3月25日。

- (3) 《明報》，1990年9月15日。
- (4) 同註2。
- (5) 以上見《經濟學人》，1991年5月11日號，頁63-65。
- (6) 同上註。
- (7) 《經濟學人》，1991年5月11日號，頁64。
- (8) 以上見《經濟學人》，1991年6月15日號，頁97。

## 第廿一章

- (1) 根據安·卡路(ANTONIO CARLO)，《結構重整的矛盾》(“CONTRADICTIONS OF PERESTROIKA”)，載《戴羅斯》，1989年春季號，頁31，附註11，戈爾巴喬夫顧問阿甘別吉揚(ABEL AGANBEGYAN)說1981-85年的增長為零。但根據《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所援引阿氏提供的數字，該五年的年均增長為3.6%(1990年3月號，頁12)。筆者相信，表 21.1從兩個不同資料來源所得到的有關數字的準確性應該沒有問題。
- (2) 卡路，1989，頁32。
- (3) 根據官方工會《勞動報》(TRUD)，1989年，56%人口生活於官方貧窮線之下(月入150盧布或以下)。見《南華早報》，1990年10月9日。
- (4) 《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
- (5) 《經濟學人》，1990年3月31日號，頁77援引朗·麥堅倫(RONALD I. MCKINNON)，《把盧布穩定下來》(“STABILIZING THE ROUBLE”)(美國經濟學會論文，1989)。麥文估計1989年比率为13%，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該年比率低於10%(《經濟學人》，1990年12月22日號，頁59)。按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DEPUTIES) 1989年12月二次會議報告，1989年比率为10%(《時代雜誌》，1990年12月25日號，頁12)。
- (6) 《經濟學人》，1991年4月6日號，頁62。
- (7) 麥堅倫，同。

- (8) 《文匯報》，1991年1月1日。
- (9) 《明報》，1991年4月4日。
- (10) 同註8。
- (11) 《文匯報》，1990年12月31日。
- (12) 《文匯報》，1991年4月11日；《明報》，1991年4月4日。
- (13) 《經濟學人》，1991年4月6日號，頁62。
- (14) 同註12。
- (15) 《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根據《文匯報》，1990年12月30日，1988年上升率為12.9%；1989年1月至9月為14.4%。
- (16) 《南華早報》，1991年1月28日。
- (17) 《經濟學人》，1990年10月6日號，頁86。
- (18) 《經濟學人》，1990年5月19日號，頁80。
- (19) 按前總理帕夫洛夫向國會提交的報告。見《文匯報》，1991年6月12日。
- (20) 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報告，見《南華早報》，1991年5月25日。
- (21) 同註19。

## 第廿二章

- (1) 以上根據英國廣播電台記錄片《第二次俄國革命》(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1991)。
- (2) 同上註。
- (3) 戈爾巴喬夫指出，一些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為了抗拒改革刻意煽動民族主義作為護身符。這有一定道理。例如，加姆薩胡爾季亞(ZVIAD GAMSUKHURDIA)在格魯吉亞內部便實行專制主義。另方面，如下文分析，民族主義與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
- (4) 同註1。
- (5) 正式來說，SAJUDIS應譯作“改革運動”(MOVEMENT FOR PERESTROIKA)。根據運動領導人解釋，用這個名字是為了使運動較易於為中央政府和蘇聯人所接受。(同註1)



但運動的實質從一開始便是一個民族運動。因此，筆者覺得，按照SAJUDIS的正式譯法把它稱作“改革運動”易於使人產生混淆。鑒於此，本文保留原文，不作任何翻譯。

- (6) 同註1。
- (7) 同註1。
- (8) 同註1。
- (9) 立共從公開支持 SAJUDIS到分裂的發展固然有民族主義成份，但同時亦是它企圖挽回自己在立陶宛的社會支持的做法。不過，正如戈爾巴喬夫把政權局部開放，企圖藉以挽回蘇共政權的認受性，但結果卻適得其反一樣，立共以上行動的效果加速了它的滅亡。
- (10) 筆者說“表面看來”因為雖然蘇聯在東歐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如上文有關波蘭變局的分析指出，即使蘇聯企圖干涉波蘭的轉變，這只會帶來波共與蘇聯的衝突，波共肯定不會再聽命於蘇聯。（匈牙利的情況亦大同小異。）
- (11) 筆者用“不戰而敗”這等字眼並非要為蘇共政權講說話，而純粹是提出客觀評論。以下類似字眼情況相同。
- (12) 詳見《經濟學人》，1990年11月24日號，頁49-51。
- (13) 這一點很好地說明戈爾巴喬夫不戰而敗的傾向。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國會通過主權宣言，但同時以704對206票反對把共和國名字RSFSR中的兩個“S”，即“蘇維埃”及“社會主義”刪除。這是保守分子及溫和改革派的一個重要勝利。但作為溫和改革派的戈在新聯盟條約草案卻輕輕地自動把這個成果白白蹣跚和斷送。
- (14) 條約內容詳見《時代雜誌》，1990年11月26日號，頁24-26。
- (15) 《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
- (16) 《經濟學人》，1990年6月9日號，頁55。
- (17) 《經濟學人》，1991年7月13日號，頁49-50。
- (18) 以上有關蘇聯國內貿易津貼，詳見同上註；《經濟學人》

,1991年7月13日號,頁21。

- (19) 《經濟學人》,1991年7月13日號,頁21。
- (20) 新聯盟條約草案從未正式公佈過,文中資料綜合自《經濟學人》,1991年6月22日號,頁53-54;6月29日號,頁44;7月13日號,頁43;《時代雜誌》,1991年9月2日號,頁25;《文匯報》,1991年7月20日;《明報》,1991年8月20日。
- (21) 轉引自《南華早報》,1990年10月1日。
- (22) 以上見《經濟學人》,1990年6月9日號,頁56;及9月29日號。
- (23) 《南華早報》,1990年10月1日;《經濟學人》,1990年10月6日號,頁86。
- (24) 《南華早報》,1990年11月29日;《明報》,1990年11月30日。
- (25) 《明報》,1990年12月2日。
- (26) 《南華早報》,1990年11月22日。
- (27) 《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
- (28) 同上註。
- (29) 《經濟學人》,1990年10月20日號。
- (30) 《文匯報》,1991年1月6日。
- (31) 《南華早報》,1991年4月6日。
- (32) 《經濟學人》,1991年4月27日號,頁77。

### 第廿三章

- (1) 安·鍾斯及威·莫斯科夫(ANTHONY JONES AND WILLIAM MOSKOFF),《蘇聯的新合作社》(“NEW COOPERATIVES IN THE USSR”),載《共產主義研究》(PROBLEMS OF COMMUNISM,這是一份美國政府官方贊助的情報性學術期刊),1989年11月至12月號,頁28。
- (2) 同上註,頁29。
- (3) 同註1。
- (4) 以下其餘有關經改的資料,除另加註明外,見《文匯報》

, 1990年12月30日; 卡路, 同, 頁36; 魯·里安弟 (LUCIO LEANTE), 《蝸牛速度的結構重整》(“PERESTROIKA AT A SNAIL'S PACE”), 載《戴羅斯》, 1989年夏季號。

- (5) 《經濟學人》, 1990年4月28日號。
- (6) 里安弟, 同, 頁86; 《時代雜誌》, 1989年3月27日號, 頁20。
- (7) 詳見《時代雜誌》, 1989年12月25日號, 頁12。
- (8) 詳見《經濟學人》, 1990年5月26日號, 頁63。
- (9) 詳見《經濟學人》, 1990年8月4日號。
- (10) 《南華早報》, 1990年10月30日。
- (11) 詳見《經濟學人》, 1990年9月8日號, 頁61-62; 1990年9月15日號, 頁91-92。
- (12) 例如, 《經濟學人》, 1990年9月15日號, 頁91。
- (13) 《南華早報》, 1990年10月11日。
- (14) 同上註。
- (15) 《南華早報》, 1990年10月12日。
- (16) 《南華早報》, 1990年10月18日及19日; 《文匯報》, 10月20日。
- (17) 《南華早報》, 1990年11月1日。
- (18) 《文匯報》, 1990年12月1日; 《明報》, 12月4日。
- (19) 《虎報》, 1991年1月5日。
- (20) 《南華早報》, 1991年1月7日。
- (21) 《經濟學人》, 1991年4月6日號, 頁62。
- (22) 詳見《經濟學人》, 1991年4月27日號, 頁77。
- (23) 同上註。
- (24) 詳見《經濟學人》, 1991年6月1日號, 頁45-46。
- (25) 轉引自《文匯報》, 1991年6月19日; 《南華早報》, 1991年6月18日。
- (26) 《南華早報》, 1991年6月24日。
- (27) 《明報》, 1991年6月28日。
- (28) 《經濟學人》, 1991年7月6日號, 頁56。
- (29) 《經濟學人》, 1991年7月2日號。

- (30) 《南華早報》，1991年7月10日。
- (31) 《經濟學人》，1991年6月15日號，頁15；《明報》，1991年7月1日。
- (32) 《明報》，1991年7月6日號。

## 第廿四章

- (1) 以上見夏雅文，同，頁40；馬里斯及雲勞思(M. MARRESE AND JAN VANOUS)，《蘇聯給東歐的貿易津貼》(SOVIET SUBSIDIZATION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柏克萊加州大學，1982)，頁x111。保加利亞的情況屬於例外，雖然它於二次大戰投靠納粹德國，蘇聯沒有要求它賠款，更相反為它提供龐大低息信貸(見約·林普(JOHN R. LAMPE)，《保加利亞廿世紀的經濟》(THE BULGARIAN EC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倫敦，1986)，頁225)。
- (2) 除東歐六國(匈、捷、保、羅、波、東)外，經互會還包括蒙古(自1962年)、古巴(自1972年)和越南(自1978年)。不過，但凡本章說及經互會，是專指東歐六國及蘇聯。
- (3) 以上見馬·拉雲(MARIE LAVIGNE)，《經互會中的蘇聯》(“THE SOVIET UNION INSIDE COMECON”)，載《蘇維埃研究》，第35卷第2期(1983年4月)，頁136。
- (4) 同上註，頁138-139。
- (5) 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52-54。
- (6) 歐殊，《經互會合作的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 OF CMEA CO-OPERATION)(布達佩斯，1972)，頁100。
- (7) 見拉雲，同，頁150，附註11。
- (8) 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9及14。
- (9) 同註8，頁53-4。
- (10) 同註8，頁49。
- (11) 同註8，頁3。
- (12) 歐殊，同，頁167及197。
- (13) 有關合作投資的資料，見拉雲，同，頁143-149；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17-19。

- (14) 以下討論詳見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68-86。說蘇聯以經濟代價換取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與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並不矛盾。不過,筆者不打算在此就這問題作出論述。
- (15) 詳見米·沙菲亞(MICHAEL SHAFIR),《羅馬尼亞:政治、經濟及社會》(ROMANI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倫敦,1985),第十章。
- (16) 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50。
- (17) 同上註。
- (18) 以上資料見拉雲,同,頁148。
- (19) 《南華早報》,1989年6月4日。
- (20) 里安弟,同,頁81。
- (21) 夏雅文,同,頁35;《南華早報》,1990年4月25日。
- (22) 夏雅文,同,頁35。
- (23) 《南華早報》,1990年4月25日。
- (24) 英國廣播電台,《第二次俄國革命》(1991)。
- (25) 《時代雜誌》,1989年6月19日號,頁24。
- (26) 亞·艾思丘莫夫(ALEXEI I. IZYUMOV),《蘇聯的非軍備化》(“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載《戴羅斯》,1989年夏季號,頁151-2。
- (27) 詳見《時代雜誌》,1989年5月22日號和6月12日號。
- (28) 《南華早報》,1989年6月4日。
- (29) 華約集團1968年11月13日通過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授權華約集團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受威脅時,給成員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即對該國進行侵略)。
- (30) 同註24。
- (31) 同註24。
- (32) 喬·索夫連(GEORGE SCHOPFLIN),《中歐及東歐共產主義的末日》(“THE END OF COMMUN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載《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1990年1月號。
- (33) 詳見《經濟學人》,1990年1月27日號,頁50;《時代雜

誌》，1990年2月26日號，頁150。

- (34) 以上見《經濟學人》，1990年1月22日號，頁50。
- (35) 《經濟學人》，1990年6月9日號，頁36-37。
- (36) 《經濟學人》，1990年9月16日號，頁54。
- (37) 《南華早報》，1990年10月11日。
- (38) 內容詳見《南華早報》，1990年11月20日。
- (39) 《南華早報》，1991年6月26日。
- (40) 《南華早報》，1991年2月13日。
- (41) 《南華早報》，1991年2月18日。
- (42) 《南華早報》，1991年2月25日。
- (43) 《文匯報》，1991年5月19日。
- (44) 《南華早報》，1991年6月29日。
- (45) 《南華早報》，1991年7月2日。
- (46) 詳細內容見《文匯報》，1991年8月1日。
- (47) 詳見《蘇聯兵工廠轉作民用》(“CONVERTING SOVIET ARMS FACTORIES”)，《經濟學人》，1990年12月15日號，頁17-19。

## 第廿五章

- (1) 以上根據英國廣播電台，《第二次俄國革命》。
- (2) 同上註。
- (3) 同註1。
- (4) 《時代雜誌》，1989年12月25日號，頁12。
- (5) 同上註。
- (6) 《南華早報》，1990年2月14日。
- (7) 《虎報》，1990年2月22日；《經濟學人》，1990年3月3日號，頁49。
- (8) “保守”、“溫和”、“激進”這些字眼的涵義都是相對性的。一個以前屬於激進的看法或立場現在可以變成保守。鑒於蘇聯局勢發展迅速，情況尤為如此。所以，但凡本文運用以上字眼時，都是相對於文中當時所論述的局勢發展階段而言。另外，第廿六章分析，就1990年

至八·一九政變這段時期而言，蘇聯保守力量中，其實有保守改革派與保守派兩股不同的勢力。但為了簡化文字表達，除在第廿六章外，筆者一律把他們統稱為保守分子、保守力量等。

- (9) 《經濟學人》，1990年3月17日號，頁49。
- (10) 《南華早報》，1990年3月12日。
- (11) 《南華早報》，1990年4月26日。
- (12) 《經濟學人》，1990年5月26日號，頁54。
- (13) 《南華早報》，1990年5月2日。
- (14) 《虎報》，1990年5月14日；英國廣播電台，《第二次俄國革命》。
- (15) 《南華早報》，1990年5月27日。
- (16) 《虎報》，1990年5月30日。
- (17) 《經濟學人》，1991年5月25日號，頁58。
- (18) 《明報》，1990年6月16日。
- (19) 《時代雜誌》，1990年7月16日。
- (20) 《南華早報》，1990年9月17日。
- (21) 《南華早報》，1990年9月20日。
- (22) 《經濟學人》，1990年12月22日號，頁60。以下有關戈1990年11月至12月的發展，見同。
- (23) 《經濟學人》，1991年1月19日號，頁49。
- (24) 同上註。
- (25) 同註1。
- (26) 同註1。
- (27) 同註22，頁51。
- (28) 同註22，頁50。
- (29) 《時代雜誌》，1991年9月2日號，頁25。

## 第廿六章

- (1) 英國廣播電台，《第二次俄國革命》。
- (2) 《經濟學人》，1991年7月20日號，頁48-49。
- (3) 一些企業經已開始自行私有化。跟東歐一樣，私有化過

程中，企業幹部為主要得益者之一。見《經濟學人》，1991年5月18日號，頁78。

- (4) 《南華早報》，1990年9月20日。
- (5) 同上註。按《南華早報》，1990年9月21日報導，票數為164對16票。雖然兩輯報導有出入，贊成票佔壓倒多數這點是沒有疑問的。
- (6) 當初，葉利欽得到利加喬夫提拔，成為莫斯科黨魁。他比戈爾巴喬夫更懂得為自己塑造形象。他帶同攝影隊搭公共巴士、在一般超級市場購物、往公立診所登記。其實，攝製完畢，他便馬上恢復享用特權，但一般人對他以上的把戲還是受落的。他的民粹主義者形象很快便建立起來。他在1988年6月第19次特別黨代表會議要求黨為他平反，但被會議拒絕的情況，呈現在蘇聯電視屏幕上，為他籌集不少政治本錢。

## 第廿七章

- (1) 《南華早報》，1991年7月20日。
- (2) 《明報》，1991年7月21日。
- (3) 《明報》，1991年7月23日。
- (4) 轉引自《明報》，1991年7月24日。
- (5) 同上註。
- (6) 同註40。
- (7)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
- (8) 《虎報》，1991年8月20日；《時代雜誌》，1991年9月2日號，頁36。
- (9) 根據美國情報消息，政變期間，基羅其夫派遣內政部捷爾任斯基 (DZERZHNSKY) 裝甲師進入莫斯科。(《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但其他關於政變的報導從來沒有提及上述裝甲師。
- (10) 以上見《明報》，1991年7月25日。
- (11) 《南華早報》，1991年7月27日。
- (12) 《經濟學人》，1991年7月6日號；《明報》，1991年7月24



- 日及25日；《南華早報》，1991年7月26日。
- (13) 《南華早報》，1991年7月27日。
- (14) 《經濟學人》，1991年7月6日號，頁55。
- (15) 《文匯報》，1991年7月28日。
- (16) 《明報》，1991年7月31日。
- (17) 《文匯報》，1991年7月30日。
- (18) 同註16。
- (19) 《文匯報》，1991年8月5日；《明報》，1991年8月4日。
- (20) 《明報》，1991年8月6日。
- (21) 《文匯報》，1991年8月7日。
- (22) 《明報》，1991年8月9日。
- (23) 《明報》，1991年8月14日。
- (24) 《文匯報》，1991年8月16日。
- (25) 轉引自《明報》，1991年8月17日。
- (26) 同上註。
- (27) 以下所有時間均為莫斯科時間。
- (28)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
- (29)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
- (30)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
- (31) 轉引自《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
- (32) 同上註。
- (33) 同註31。
- (34) 轉引自《明報》，1991年8月20日。
- (35) 詳見同上註。
- (36) 同註28。
- (37) 同註29。
- (38) 命令內容詳見同註30。其他資料見同註34；《文匯報》，1991年8月21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
- (39)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7日。
- (40) 以上見《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明報》，1991年8月20日。

- (41) 同註29。
- (4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
- (43) 《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及25日。
- (44) 同註29。
- (45) 同註42。
- (46) 同註31。
- (47) 同註31。
- (48)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9日。
- (49) 同註29。
- (50) 同註34。
- (51) 同註42。
- (5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6日及29日。
- (53) 以上見《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明報》，1991年8月20日；《虎報》，1991年8月20日。
- (54) 同註31。
- (55) 同註34。
- (56) 《經濟學人》，1991年8月24日號，頁18。
- (57) 同註34。
- (58) 轉引自同註31。
- (59) 同註31。
- (60) 同註31。
- (61) 以上見《文匯報》，1991年8月20日；《明報》，1991年8月20日；《虎報》，1991年8月20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
- (6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20日凌晨莫斯科現場衛星報導。
- (63)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3日。
- (64) 《明報》，1991年8月21日。
- (65) 《時代雜誌》，1991年9月2日號，頁31。
- (66) 同註28。
- (67) 《文匯報》，1991年8月21日。

- (68) 同上註。
- (69) 以上資料綜合自《明報》，1991年8月21日；《文匯報》，1991年8月21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及25日。
- (70) 同註39。
- (71) 同註67。
- (72) 轉引自同註42。
- (73)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及25日。
- (74) 同註28。
- (75) 同註28。
- (76) 同註42。
- (77) 同註67。
- (78) 同註42。
- (79)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2日及25日。
- (80) 《文匯報》，1991年8月21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
- (81)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及25日。
- (8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2日。
- (83) 同註65。
- (84) 同註42。
- (85) 同註42。
- (86) 同註64。
- (87) 同註42。
- (88) 同註42。
- (89) 同註42。
- (90) 同註56, 頁18。
- (91) 同註65, 頁28。
- (9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及24日。
- (93) 同註56, 頁18。
- (94) 同註29。
- (95) 同註42。
- (96) 同註42。
- (97) 同註64。

- (98) 同註67。
- (99) 同註64。
- (100) 同註82。
- (101) 同註65,頁29。
- (102) 同註65,頁31。
- (103) 除另加註明外,以上見《南華早報》,1991年8月28日所載提交俄羅斯議會的一份官方文件。
- (104) 同註39。
- (105)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8日。
- (106) 同註82。
- (107) 同註82。
- (108) 同註105。
- (109) 《文匯報》,1991年8月22日。
- (110) 同註28。
- (111) 同註28。
- (112) 同註105。
- (113)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時代雜誌》,1991年9月2日號,頁32。
- (114)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2日及25日。
- (115) 同註82。
- (116) 同註56,頁18。
- (117) 同註82。
- (118) 同註109。
- (119) 同註82。
- (120) 同註29。
- (121) 同註28。
- (122) 《文匯報》,1991年8月22日;《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
- (123) 同註105。
- (124) 同註82。
- (125) 同註28。
- (126) 同註28。

- (127) 同註82。
- (128) 《明報》，1991年8月23日。
- (129) 同上註。
- (130) 同註128。
- (131) 同註29。
- (132) 同註29。
- (133) 同註28。
- (134) 《文匯報》，1991年8月25日。
- (135) 同註82。
- (136) 同註82。
- (137) 同註56, 頁17。
- (138) 同註65, 頁28。
- (139) 同註39。
- (140) 同註39。
- (141) 同註39。
- (142) 《南華早報》，1991年8月24日及25日。
- (143) 同註28。
- (144) 同註65, 頁27。
- (145) 同註56, 頁17。
- (146) 《時代雜誌》，1991年9月9日號，頁24；《南華早報》，1991年8月30日。
- (147) 同註105。
- (148) 同註82。
- (149) 歐共體最為「慷慨」，但亦只不過批准了6.25億美元的信貸保證供購買糧食用，和5.2 億的技術援助。(《南華早報》，1991年8月21日)上文提及的85.4億不過是一個虛數。英、美、日等國更加一毛不拔。
- (150) 同註64。
- (151) 同註105。
- (152) 《經濟學人》，1991年8月24日號，頁18；《南華早報》，1991年8月25日。
- (153) 同上註。

- (154) 同註152。
- (155) 同註63。
- (156) 同註63。
- (157) 同註56, 頁18。
- (158) 《南華早報》, 1991年9月2日。
- (159) 《南華早報》, 1991年8月31日。
- (160) 同註145。
- (161) 同註159。
- (162) 《南華早報》, 1991年8月31日; 《經濟學人》, 1991年8月24日號, 頁19。
- (163) 同註56, 頁19。
- (164) 《經濟學人》, 1991年8月31日號, 頁38。
- (165) 同註159。

## 第廿八章

- (1) 以上見葛·納田(GERT LEPTIN)及萬·梅爾沙(MANFRED MELZER), 《東德工業改革》(ECONOMIC REFORM IN EAST GERMAN INDUSTRY)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78), 頁XV-XVI及頁4。
- (2) 同上書, 頁7。
- (3) 同註1, 頁6。
- (4) 同上註。
- (5) 同註1, 頁9。
- (6) 同註1, 頁11。
- (7) 同註1, 頁163。
- (8) 同註1, 頁164。
- (9) 同註1, 頁75-77。
- (10) 同註1, 頁78。
- (11) 同註1, 頁164。
- (12) 同註1, 頁161。
- (13) 史洛基斯蒂, 同, 頁197。
- (14) 同上註, 頁198。

- (15) 同註1,頁175-6。
- (16) 同上註。
- (17) 同註13,頁69。
- (18) 同註13,頁71。
- (19) 菲·彼里遜(PHILLIP J. BRYSON)及梅爾沙,《東德經濟的結束》(THE END OF THE EAST GERMAN ECONOMY)(倫敦,1991),頁32。
- (20) 同上註,頁26。
- (21) 同上註。
- (22) 同註19,頁89。據一般報刊報導,數字為210億美元(例如,《明報》,1990年10月23日)。
- (23) 這些比例根據1985年的數字計算(見史洛基斯蒂,同,頁194)。
- (24) 筆者手頭資料沒有東德1989年的償債率。筆者亦沒有信貸還款期結構等資料以供進行準確的計算。根據上文有關資料,筆者粗略估計上述比率不會超過40%,比波蘭及匈牙利的情況鬆動得多。
- (25) 同註1,頁XV及頁5。
- (26) 同註1,頁32。
- (27) 同註1,頁150。
- (28) 同註1,頁98。
- (29) 同註1,頁41。
- (30) 同註1,頁17。
- (31) 同註1,頁53及64。
- (32) 同註1,頁54及55。
- (33) 同註1,頁45-47及126。
- (34) 同註1,頁41及45。
- (35) 同註1,頁20。
- (36) 同註1,頁55。
- (37) 同註1,頁36。
- (38) 同註1,頁38。
- (39) 同上註。

- (40) 同註1,頁49-50。
- (41) 同註1,頁42。
- (42) 同上註。
- (43) 同註1,頁84。
- (44) 同註1,頁13。
- (45) 同註1,頁47。
- (46) 同註1,頁68。
- (47) 以上見同註1,頁68-69及117。
- (48) 同註1,頁101。
- (49) 同註1,頁78及121。
- (50) 同註1,頁118。
- (51) 同上註。
- (52) 同註1,頁109。
- (53) 同註19,頁6。
- (54) 同註19,頁31-2。
- (55) 同註19,頁31。
- (56) 同註19,頁5。
- (57) 同註19,頁32。
- (58) 同上註。
- (59) 同註19,頁6-7。
- (60) 同註19,頁41。
- (61) 同註19,頁42-3。
- (62) 同註19,頁38。
- (63) 同註19,頁44-45及69。
- (64) 同註19,頁69。
- (65) 同註19,頁47。
- (66) 梅恩,同,頁,7。
- (67) 同上註,頁8。
- (68) 同註66,頁17。
- (69) 同註66,頁18。
- (70) 同註66,頁69。
- (71) 同註66,頁75。



- (72) 同註66,頁86。
- (73) 同註66,頁88-89。
- (74) 同註66,頁91。
- (75) 同註66,頁97-103。
- (76) 同註66,頁98。
- (77) 同註66,頁147。
- (78) 同註66,頁164。
- (79) 同註66,頁152。
- (80) 同註66,頁189。
- (81) 同上註。
- (82) 馬里斯及雲勞思,同,頁50。
- (83) 根據表28.15的數字作出的粗略估計。由於:(1)表28.15第一列與第二列的差額不限於對經互會貿易;及(2)表28.15的數字為當時價格,而80.35億這個數為1980年現時價值,故無法計算出準確數字。
- (84) 同註66,頁191。
- (85) 同註66,頁192。
- (86) 同註66,頁204。
- (87) 以見同上註。
- (88) 同註66,頁213。
- (89) 同註66,頁219。
- (90) 同註66,頁220-247。
- (91) 同註66,頁4。
- (92) 同註66,頁8。
- (93) 同註66,頁42。
- (94) 同註66,頁44-6。
- (95) 同註66,頁53。
- (96) 同註66,頁93。
- (97) 同註66,頁81-83。
- (98) 同註66,頁80。
- (99) 同註66,頁102。
- (100) 同註66,頁110-111。

- (101) 同註66, 頁113。  
(102) 同註66, 頁120-22。  
(103) 轉引自同註66, 頁152。  
(104) 同註66, 頁179。  
(105) 同註66, 頁181。  
(106) 同註66, 頁182-4。  
(107) 同註66, 頁209-211。  
(108) 同註66, 頁211-13。  
(109) 同註66, 頁249。  
(110) 以上見同註66, 頁250-1及261。  
(111) 林普, 同, 頁14。  
(112) 同上註, 頁142。  
(113) 同註111, 頁143。  
(114) 同註111, 頁144及169。  
(115) 同註111, 頁144。  
(116) 同註111, 頁159。  
(117) 同上註。  
(118) 同註111, 頁160。  
(119) 同上註。  
(120) 同註111, 頁165。  
(121) 同註111, 頁177。  
(122) 同註111, 頁192。  
(123) 同註111, 頁191。  
(124) 同註111, 頁193-5。  
(125) 同上註。  
(126) 同註111, 頁182。  
(127) 同註111, 頁178。  
(128) 同註111, 頁177-8。  
(129) 同註111, 頁16及180。  
(130) 同註111, 頁179。  
(131) 同註111, 頁180。  
(132) 同註111, 頁188。

- (133) 同註111,頁182。
- (134) 馬里斯及雲勞斯,同,頁50。
- (135) 同註111,頁187-88。
- (136) 亞·彼達西奧( ARMANDO PITASSIO),《保加利亞的改革政治》(“REFORM POLITICS IN BULGARIA”),載《戴羅斯》,1989年春季號,頁204。
- (137) 《經濟學人》,1991年3月2日號。
- (138) 同註111,頁124。
- (139) 同註111,頁148-9。
- (140) 同註111,頁210。
- (141) 同註111,頁135。
- (142) 同註111,頁150。
- (143) 同註111,頁149。
- (144) 同註111,頁206。
- (145) 同註111,頁207。PAK後來易名為NPK或NPO,分別在於NPK/NPO加入了一些科研、技術單位。(同註111,頁209)
- (146) 同上註。
- (147) 以上見同註111,頁208。
- (148) 以上見同註111,頁210-12。
- (149) 以上及下文關於1963-68年實行的“新管理體制”,見同註111,頁200-204。
- (150) 同註111,頁146。
- (151) 同註111,頁213。
- (152) 同上註。
- (153) 以上及下文關於1978-83年的情況,見同註111,頁215-219。
- (154) 同註111,頁221,附註34。
- (155) 關於企業如何保留在嚴格監督之下的情況,見彼達西奧,同,頁211-13。
- (156) 以上見彼達西奧,同,頁209-211。
- (157) 以上見沙菲亞,同,頁107-8。
- (158) 以上見同上註,頁47及109。

- (159) 以上見同註157,頁112。
- (160) 同註157,頁110。
- (161) 根據史洛基斯蒂,同,頁31-32資料計算。
- (162) 史洛基斯蒂,同,頁64。
- (163) 同註157,頁115。
- (164) 同註157,頁107。
- (165) 同註157,頁116。
- (166) 同註157,頁119。
- (167) 史洛基斯蒂,同,頁194-5。
- (168) 同上註,頁44。
- (169) 同註157,頁117-8。
- (170) 史洛基斯蒂,同,頁69。
- (171) 同上註,頁71。
- (172) 史洛基斯蒂,同,頁69及71。
- (173) 史·森遜(STEVEN L.SAMPSON),《羅馬尼亞:紙牌房子》  
(“ROMANIA : A HOUSE OF CARDS”),載《戴羅斯》,  
1989年春季號,頁217-224。
- (174) 《經濟學人》,1991年3月2日號。
- (175) 以上見同註157,頁120-1。
- (176) 同上註。
- (177) 同註157,頁121。
- (178) 以下關於“新經濟及財政機制”的資料,見同註157,頁  
123-6。
- (179) 同上註。
- (180) 安德遜(E. E.ANDERSON),《東歐中央計劃及生產的不穩定性》  
(“CENTRAL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INSTABILITIES IN EASTERN EUROPE”),載《斯拉夫評論》  
(SLAVIC REVIEW)第二期,轉引自同註157,頁126。

## 第廿九章

- (1) 科爾奈,1986,頁1691提出同一觀點。
- (2) 筆者手頭上掌握到有關羅馬尼亞的經改資料到1984年為

限。但沒有任何資料或象顯示羅馬尼亞於1984年後作出過重大改革(如註1指出,科爾奈1986年底談及東歐各國改革進程時,把匈牙利和波蘭與東德、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蘇聯加以區別)。

- (3) 東德變局之初,第四國際理論權威(厄·曼德爾(ERNEST MANDEL)把群眾運動形容為第四國際理論中的政治革命(工人起來推翻官僚,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但他也不得不承認,“罷工仍然未有發生”。(《國際觀點》,174期(1989年11月27日),頁5)事態的發展對於這種毫無根據的論斷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
- (4) 華·舒碧(WALTER SUB),《東德的防衛政治》(“EAST GERMANY'S DEFENSIVE POLITICS”),載《戴羅斯》,1989年春季號,頁165。
- (5) 同上註,頁170。
- (6) 同註4,頁169。
- (7) 同註4,頁170-1。
- (8) 同註4,頁168。
- (9) 同註4,頁175。
- (10) 同註4,頁174。
- (11) 同註4,頁174-5。
- (12) 同註4,頁176-177。
- (13) 詳見同註4,頁178-9。
- (14) 同註4,頁179。
- (15) 條約規定兩國不容許對方公民在沒有批准下通過本國國土前往第三個國家。
- (16) 《時代雜誌》,1989年9月25日號,頁18。
- (17) 同上註,頁17。
- (18) 《國際觀點》,175期(1989年12月11日),頁8。
- (19) 《國際觀點》,174期(1989年11月27日),頁8。
- (20) 《時代雜誌》,1989年12月11日號,頁37。
- (21)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13日。
- (22) 米·里曼(MICHAL REIMAN),《布拉格之春與重整》

(“PRAGUE SPRING AND PERESTROIKA”), 載《戴羅斯》，1989年春季號，頁159。

- (23) 同上註，頁161。
- (24) 同註21，頁159，附註3。
- (25) 同註21。
- (26) 同註21，頁161。
- (27) 同註21，頁162。
- (28) 同上註。
- (29) 《時代雜誌》，1989年11月6日號，頁23。
- (30) 《虎報》，1990年5月16日號。
- (31) 《時代雜誌》，1989年12月11日號，頁28。
- (32) 《國際觀點》，177期(1990年1月29日)，頁13。
- (33) 著名捷克左翼分子彼·柯爾(PETER UHL)也承認這點。  
見同上註。
- (34) 同註32。
- (35) 同註32。
- (36) 《經濟學人》，1990年6月2日號，頁45。
- (37) 彼達西奧，同，頁213。按：索菲亞空氣污染情況頗為嚴重，  
交通繁忙是原因之一。
- (38) 同上註，頁210-11。
- (39) 同註36，頁214。
- (40) 同註36，頁215。
- (41) 同註36，頁216。
- (42) 同註36，頁216，附註62。
- (43) 《時代雜誌》，1989年11月6日號，頁23。
- (44) 《時代雜誌》，1989年11月27日號，頁22。
- (45) 森遜，同，頁218。
- (46) 同註44，頁219。
- (47) 同上註。
- (48) 同註45。
- (49) 同註44，頁221。
- (50) 同上註。

- (51) 《明報》，1990年8月25日；另見《南華早報》，1990年2月18日。
- (52) 同上註。
- (53) 同註44，頁218-9。
- (54) 《經濟學人》，1990年1月1日號，頁52。
- (55) 同上註。
- (56) 同註50。
- (57) 《經濟學人》，1990年2月24日號，頁51。
- (58) 林普指出，保加利亞經濟在保共執政下取得歷史上最佳成績，否認這個事實是“不誠實的”。(同，頁223)很多對東歐的評論都犯上一個通病：以西歐的經濟水平來量度東歐人的經濟不滿。查實，東歐一向比西歐落後，不見得東歐人會無視這個事實。例如，匈牙利人滿足於匈牙利作為一個“較為貧窮的奧地利”這個角色。(史雲，1989，頁27)。
- (59) 《經濟學人》，1991年10月5日號，頁62。
- (60) 《經濟學人》，1991年11月16日號，頁64。
- (61) 這是根據筆者1990年6月收聽英國廣播電台得到的資料。
- (62) 東歐各國的反對派以羅馬尼亞反對派最為不成熟，分裂情況也最嚴重。
- (63) 一些人會把這歸咎於羅馬尼亞人缺少西方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筆者不打算在此就這種基本上屬於唯心的論點作出討論。
- (64) 《經濟學人》，1990年4月28日號，頁59。
- (65) 《經濟學人》，1990年9月8日號，頁64。
- (66) 《經濟學人》，1991年11月9日號，《捷克的私有化：尋找乾淨資金》(“CZECHOSLOVAKIA'S PRIVATIZATION: SEEKING CLEAN CAPITAL”)。

## 外一章：蘇東聯的角爭骨豐

- (1) 《文匯報》，1991年12月1日。
- (2) 《經濟學人》，1991年12月7日號，頁55。

- (3) 《文匯報》，1991年10月2日及3日。
- (4) 轉引自《南華早報》，1991年10月12日。
- (5) 《經濟學人》，1991年10月19日號，頁58。
- (6) 《南華早報》，1991年10月20日及11月7日。
- (7)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7日。
- (8) 《南華早報》，1991年10月30日及11月7日。
- (9)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22日。
- (10) 《經濟學人》，1991年9月28日號，頁59。
- (11) 《文匯報》，1991年12月31日。
- (12)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21日。
- (13)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2日。
- (14) 同上註。
- (15)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17日。
- (16) 《文匯報》，1991年10月17日。
- (17) 《文匯報》，1991年10月17日；《南華早報》，1991年11月17日。
- (18) 《文匯報》，1991年11月23日；《南華早報》，1991年11月23日。
- (19) 《南華早報》，1991年11月30日。
- (20) 《文匯報》，1991年11月30日；《南華早報》，1991年12月1日。
- (21) 《南華早報》，1991年12月1日。
- (22) 《文匯報》，1991年11月30日。
- (23) 《文匯報》，1991年12月4日。
- (24) 《文匯報》，1991年10月11日。
- (25) 《文匯報》，1991年10月24日。
- (26) 《文匯報》，1991年11月16日。
- (27) 《文匯報》，1991年12月1日。
- (28) 同上註。
- (29) 《經濟學人》，1991年12月7日號，頁55。
- (30) 《南華早報》，1991年12月12日。
- (31) 《文匯報》，1991年12月13日。



- (32) 《文匯報》，1991年10月2日。
- (33) 同上註。
- (34) 《文匯報》，1991年10月17日。
- (35) 同上註。
- (36) 《文匯報》，1991年11月20日。

## 人物譯名表

除一些廣為人知曉的人物如雅魯澤爾斯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外，文中每當首次提到一個人（政治人物、著者等全部包括在內），都附上該人之英語名字，以後則用中文譯名。以下譯名表是為方便讀者翻查而設。

Adam, Jan	亞當
Ademec, Ladislav	阿當麥
Aganbegyan, Abel	阿甘別吉揚
Akhromeev, Sergei	阿赫羅梅耶夫
Alexandrov, Chudomir	亞歷山大洛夫
Alexei	阿納塞
Alksnis, Victor	艾思尼斯
Anderson, E.E.	安德遜
Andreyeva, Nina	安德魯艾娃
Antall, Jozsef	安托爾
Aslund, Anders	阿斯倫特
Atanasov, Georgi	阿丹尼索夫
Ausch, Sandor	歐殊
Bakatin, Vadim	巴卡京
Baklanov, Oleg	巴克拉諾夫
Bakowski, Pawel	巴克科斯基
Balassa, Bela	巴拉沙
Barannikov, Viktor	巴蘭尼科夫
Bauer, Tamas	鮑威爾
Berend, Ivan	巴蘭特
Bielecki	別萊茨基
Bihari, Mihaly	比夏力
Biro, Zoltan	拜盧
Blazycza, George	白拉錫卡
Bloch, Andrzej	布洛

Bocharov, Mikhail	博哈洛夫
Boldin, Yuri	波爾丁
Brazauskas	巴拉索思卡斯
Brucan, Silviu	布魯根
Bruz, W.	布魯斯
Bryson, Phillip J.	彼里遜
Bugaj, Ryszard	布吉
Bujak, Zbigniew	布席克
Burbulis, Gennadi	波爾貝里斯
Calfa, Marian	卡爾法
Campeanu, Radu	甘彼安魯
Carlo, Antonio	卡路
Chernayev, Vladimir	切爾維耶夫
Chikin, Valentin	捷金
Cliff, Tony	基里夫
Cook, Edward	谷克
Csaki, Csaba	沙基
Donath, Ferenc	唐納夫
Dubcek, Alexander	杜布切克
Faleyev	費拉耶夫
Falus-Szikra, K.	科洛斯史斯格拿
Feher, Lajos	費哈爾
Fock, Jeno	霍克
Fokin, V.	福金
Friedman, Milton	費里民
Fukuyama, Francis	福山
Gabor, Istvan	基巴
Galasi, P.	格拉西
Gamsakhurdia, Zviad	加姆薩胡爾季亞
Geraschenko	格拉先科
Gerasimov, Gennady	基拉西莫夫
Geremek, Bonislav	謝拉麥克

Gierek	蓋萊克
Glemp	格林普
Gomulka, W.	禾·哥穆爾卡
Gomulka, S.	史·哥穆爾卡
Golovatov, Mikhail	戈羅維多夫
Goncharov, Sergei	干查洛夫
Goncz, Arpad	崗斯
Grachev, Pavel	格拉喬夫
Grishin, V.	基里辛
Gromov, Boris	基羅莫夫
Grosz, Karoly	格羅斯
Gwiazda, Andrzej	茲維亞仕達
Gysi	居西
Halliday, Fred	賀力第
Hare, P.G.	夏雅爾
Harman, Chris	夏雅文
Hewitt, Edward	曉域特
Hughes, Gordon	曉仕
Husak, Gustav	胡薩克
Ignatenko, Vitaly	日尼丹科
Ivashko, Vladimir	伊華殊高
Izumov, Alexei I.	艾思丘莫夫
Jacques, Martin	沙克斯
Jakes, Milos	雅克什
Janas, Zbigniew	恩尼斯
Jaroszewicz	雅魯蘇域治
Jedynak, Tadeusz	積迪納克
Jones, Anthony	鍾斯
Juhasz, Pal	沃賀斯
Jurek, Marek	佐力克
Jurczyk, Marian	佐錫克
Kalinin	加里寧

Karimov, Islam  
Kaser, M.C.  
Kazannik, Alexei  
Kiszczak, Czeslaw  
Kobets, Konstantin  
Kolankiewicz, G.  
Kornai, Janos  
Kosygin  
Kozyrev, Andrei  
Kravchenko, Leonid  
Kravchuk, Leonid  
Kryuchkov, Vladimir  
Kuron, Jacek  
Kuzmin  
Laky, T.  
Lampe, John R.  
Lange, Oskar  
Lavigne, Marie  
Leante, Lucio  
Lengyel, Laszlo  
Leptin, Gert  
Lewandowski, Janusz  
Lewis, P.G.  
Lieberman, Evgeni  
Ligachev, Yegor  
Lilov, Alexander  
Lukanov, Andrei  
Lukyanov, Anatoly  
Maiziere, Lothar de  
Makashov, Albert  
Mandel, Ernest  
Manescu, Corneliu

卡里莫夫  
基撒  
卡山力赫  
基茨澤克  
科柏斯  
哥蘭基艾域奇  
科爾奈  
柯錫金  
柯斯尼夫  
克拉夫珍科高  
克拉夫丘克  
克留奇科夫  
庫倫  
庫茲明  
勒基  
林普  
蘭格  
拉雲  
里安弟  
蘭高  
納田  
魯雲杜斯基  
勞易斯  
利別爾曼  
利加喬夫  
李洛夫  
盧基諾夫  
盧基揚諾夫  
馬齊埃爾  
馬加索夫  
曼德爾  
萬力斯庫

Marer, Paul  
Marrese, M.  
Mattick, Paul  
McGregor, James P.  
McKinnon, R.I.  
Melzer, Manfred  
Michnik, Adam  
Mikulín, Ivan  
Milea, Vasile  
Militaru, Nicolae  
Mladenov, Peter  
Modzelewski, Karol  
Moiseyev, Mikhail  
Moskoff, William  
Muravski, Valeriu  
Mutalibov, Ayaz  
Myant, Martin  
Nagy, Imre  
Nazarbayev, Nursultun  
Nemeth, Miklos  
Novotny  
Nyers, Rezso  
Orlov, Vladimir  
Ost, David  
Paszynski, Aleksander  
Peter, Gyorgy  
Petrakov, Nikolai  
Pinochet  
Pitassio, Armando  
Polozkov, Ivan  
Polyakov, Vladimir  
Poulantzas, Nicos

馬勒  
馬里斯  
麥蒂克  
麥克加力格爾  
麥堅倫  
梅爾沙  
米茲力克  
米古連  
米利亞  
米尼塔魯  
姆拉德諾夫  
莫蘇勞斯基  
莫伊謝耶夫  
莫斯科夫  
梅納夫斯基  
梅達里波夫  
梅思  
納吉  
納扎爾巴耶夫  
藍馬夫  
勞鋼尼  
列亞什  
奧爾洛夫  
柯斯特  
柏善斯基  
彼得  
彼得科夫  
皮諾切特  
彼達西奧  
波洛茲科夫  
波里阿科夫  
普蘭薩

Pozsgay, Imre	波茲蓋
Preobrazhensky, E.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Primakov, Yevgeny	彼馬科夫
Pugo, Boris	普戈
Quaisser, Wolfgang	奎薩
Radice, H.K.	雷達斯
Rakowski, Mieczyslaw	拉科斯基
Ratiu, Ion	拉圖
Reiman, Michel	里曼
Richet, Xavier	里切
Rocard, Michel	羅卡爾
Roman, Petre	羅曼
Rosdolsky, R.	羅斯多爾斯基
Rostowski, J.	羅斯杜亞斯基
Rozsypal	洛斯普爾
Rulewski, Jan	魯勞斯基
Rutskoi	魯茨科伊
Sachs, Jeffrey	薩克斯
Sampson, Steven L.	森遜
Samsonov, Viktor(一說Alexander)	薩姆索諾夫
Savicki, Florian	史柯域基
Scherbitsky	謝爾別斯基
Schopflin, George	索夫連
Shafir, M.	沙菲亞
Shaposhnikov, Yevgeny	沙波什尼科夫
Shatalin, Stanizlaw	沙塔林
Shebarshin, Leonid	舍巴爾申
Sik, Ota	錫克
Silayev, Ivan	西拉耶夫
Slansky, Rudolf	史蘭斯基
Smuga, Cyril	史墨格
Snegur, Mircea	史尼戈爾

Sobchak, Anatoly	索布恰克
Solovyov, Yuri	梳羅夫可夫
Spiridonov, Lev	史別列當諾夫
Staniszkis, S.	史丹尼斯吉斯
Stankevich, Sergei	史丹基域奇
Stark, D.	史達克
Starodubtsev, V.	斯塔羅杜布和夫
Stepan, Miroslav	史塔班
Strauss, Robert	史特勞斯
Strougal	史特勞高
Sub, Walter	舒碧
Surkov, Mikhail	梳爾科夫
Svain, Nigel	史雲
Tardos, Marton	達多斯
Tarkowski, Jacek	達爾考科斯基
Tikhanov, Yuri	狄漢諾夫
Timar, Matyas	狄馬
Tizyakov, A.	季茲亞科夫
Tokes, Laszlo	陶克斯
Tretyak, Ivan	切狄亞克
Trushin, Vasily	特魯欣
Tyminski, Stanislaw	蒂明斯基
Tyurkin, Viktor	泰柯爾堅
Uhl, Peter	柯爾
Ulbricht, W.	丘別列
Urban, Laszlo	柯班
Urbanek, Karel	烏爾班內克
Vanous, Jan	雲勞思
Varennikov, Valentin	華爾蘭力科夫
Volsky, Arkady	戈爾斯基
Wanless, P.T.	溫里斯
Wilczek, Mieczyslaw	維曉澤克



**Wolnicki, Miron**  
**Yakovlev, Alexander**  
**Yavlinsky, Grigory**  
**Yazov, Dmitry**  
**Zloch-Christy, Iliana**

戈奧力基  
亞科夫列夫  
亞夫林斯基  
亞佐夫  
史洛基斯蒂

## 資料出處索引

按：本文註明資料出處採用以下規格：（作者名字），（著作出版日期或“同”），（頁碼）。為方便讀者查照，特備下面索引。索引不包括轉引自報刊的材料及本文沒有直接引述的其他參考材料。

- Adam, Ja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of the 1980's" in SOVIET STUDIES vol.39 no.4(Oct.1987).
- Anderson, E.E., "Central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Instability in Eastern Europe" in SLAVIC REVIEW no.2.
- Aslund, Anders, "The Function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 in SS vol.36 no.3 (July 1984).
- Ausch, Sando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MEA CO-OPERATION (Budapest, 1972).
- Balassa, Bela, "Reforming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7(1983).
- Bauer, Tamas, "The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vol.15 no.1 (Fall 1976); "The Hungarian Alternative to Soviet-Type Planning" in JCE no.7(1983); "The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Ownership Relations" in EEE vol.22 nos.3-4(Spring-Summer 1984).
- Berend, Iva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1953-1988(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 Blazyca, George, "The USSR: Unrelenting Economic

- Pressure for Reform" in CAPITAL AND CLASS  
no.38(Summer 1989).
- Bloch, Andrzej, "The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in  
TELOS no.66(Winter 1985-86).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The Second Rus-  
sian Revolution" (1991).
- Bryson, Phillip J. & Melzer, Manfred, THE END OF  
THE EAST GERMAN ECONOMY (London, 1991).
- Carlo, Antonio,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in TELOS no.21(1974);  
"Contradictions of Perestroika" in TELOS  
(Spring 1989).
- Cliff, Tony,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1988).
- Cook, Edward, "Agricultural Reform in Poland" in  
SS vol.36 no.3(July 1984).
- Csaki, Csaba,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  
ion of Hungarian Agriculture" in JCE  
no.7(1983).
- Falus-Szikra, K., "Wage and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Econom-  
ies in Hungary" in ACTA OECONOMICA  
vol.36 (1-2)(1986).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
- Gabor, Istvan, "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 in  
AO vol.22(3-4)(1979).
- Gabor, Istvan, & Galasi, P., "The Labour Market in  
Hungary Since 1968" in Hare, P. G., Radice,  
H.K. and Swain, N.(eds.)HUNGARY: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 (London, 1981).
- Gomulka, S., & Rostowski, J., "The Reformed Polish

- Economic System 1982-1983" in SS vol. 36 no.3 (July 1984).
- Halliday, Fr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NEW LEFT REVIEW no. 180(1990).
- Hare, P.G., "Industrial Prices in Hungary" (Part 1) in SS vol.28 no.2(April 1976);  
 "Industrial Prices in Hungary" (Part 2) in SS vol. 28 no.3(July 1976); "The Investment System in Hungary" in Hare, Radice and Swain, op.cit.; "The Beginning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Hungary" in SS vol. 35 no.3(July 1983).
- Hare, P.G., Radice, H.K. and Swain, N., HUNGARY: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 (London, 1981).
- Hare, P. G. & Wanless, P. T., "Polish and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 A Comparison" in SS vol. 33 no.4(Oct.1981).
- Harman, Chris, "The Storm Break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46(Spring 1990); "The State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S no.51 (Summer 1991).
- Hewitt, Edward A.,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 EQUALITY VS EFFICIENCY(Washington,1988).
- Hughes, Gordon, "Are The Costs of Cleaning Up Eastern Europe Exaggerated?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i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7 no.4.
- 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eres, POLAND : 1970-71(Detroit, 1977).
- Izyumov, Alexei I.,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ELOS (Summer1989).

- Jacques, Martin, "After Communism" in MARXISM TODAY (Jan.1990).
- Jones, Anthony & Moskoff, William "New Co-operatives in the USSR"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Dec. 1989).
- Kaser, M. C. (e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vol.1(London, 1986).
- Kolankiewicz, G. & Lewis, P.G.,POLAN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88).
- Kornai, Janos,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1980);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in JCE no.7(1983);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4 (Dec. 1986).
- Laky, T., "Small Enterprises in Hungary--Myth and Reality" in A0 vol.32(1-2) (1984).
- Lampe, John R., THE BULGARIAN EC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London, 1986).
- Lavigne, Marie, "The Soviet Union Inside Comecon" in SS vol.35 no.2.
- Leante, Lucio, "Perestroika at a Snail's Pace" in TELOS (Summer 1989).
- Leptin, Gert and Melzer, Manfre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 GERMAN INDUSTRY (Oxford Univ. Press, 1978).
- Mandel, Ernest,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and the Dangers that Threaten It" 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174 (Nov. 27, 1989).
- Marer, Paul, "The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of Hungary's Foreign Trade" in Hare,Radice

and Swain, op.cit..

Marrese, M., "The Evolution of Wage Regulation in Hungary" in Hare, Radice and Swain, op.cit.;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Hungary" in JCE no.7(1983).

Marrese, M., and Vanous, J., SOVIET SUBSIDIZATION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UC Berkeley, 1982).

Mattick, Paul, MARX AND KEYNES :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London, 1980).

McGregor, James P.,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sh Public Opinion" in SS vol.xli no.2(April 1989).

McKinnon, R.I., "Stabilizing the Rouble" (American Economics Society, 1989).

Myant, Martin, THE CZECHOSLOVAK ECONOMY 1948-1988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9).

Nyers, Rezso,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in JCE no.7(1983).

Ost, Davi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lidarity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Europe" in TELOS (Spring 1989).

Pitassio, Armando, "Reform Politics in Bulgaria" in TELOS (Spring 1989).

Poulantzas, Nico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Urry, J. and Wakeford, J.(eds.), POWER IN BRITAIN(London, 1973); "The Capitalist State :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in NLR (Jan.-Feb. 1976).

Preobrazhensky, E., THE NEW ECONOMICS (London, 1965).

Quaisser, Wolfgang, "Agricultural Price Policy and

- Peasant Agriculture in Poland" in SS  
vol.38 no.4(Oct.1986).
- Radice, H.K.,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Hungary and the West" in Hare, Radice  
and Swain, op.cit..
- Reiman, Michel, "Prague Spring & Perestroika" in  
TELOS (Spring 1989).
- Richet, Xavier, "Is There an 'Hungarian' Model of  
Planning ?" in Hare, Radice and Swain,  
op.cit..
- Rosdolsky, R.,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1989).
- Rostowski, J., "The Decay of Socialism and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Poland"  
in SS vol.xli no.2(April 1989).
- Sampson, Steven L., "Romania : A House of Cards"  
in TELOS (Spring 1989).
- Schopflin, George,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 1990).
- Shafir, M., ROMANIA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85).
- Smuga, Cyril, "Regime Takes a Leap into the Dark"  
in IV no.163(May 15, 1989).
- Stark, David,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Firm and  
the Macropolitics of Reform : New Forms  
of Workplace Bargaining in Hungarian  
Enterprises" in STATE VS MARKET IN THE  
WORLD SYSTEM (California, 1985).
- Sub, Walter, "East Germany's Defensive Politics"  
in TELOS (Spring 1989).
- Swain, Nigel, "The Evolution of Hungary's Agricul-

tural System Since 1967" in Hare, Radice and Swain, op.cit.; "Hungarian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1980's: Retrenchment Followed by Reform" in SS vol.39 no.1 (Jan. 1987); "Hungary's Socialist Project in Crisis" in NLR no.174(1989).

Tardos, Marton, "The Role of Money :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erprise in Hungary" in A0 vol.25 (1-2)(1980); "The Increasing Role and Ambivalent Recep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Hungary" in JCE no.7 (1983).

Tarkowski, Jacek, "Old and New Patterns of Corruption in Poland and The USSR" in TELOS (Spring 1989).

Urban, Laszlo, "Hungary in Transition : The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ELOS (Spring 1989).

Wanless, P.T., "Economic Reform in Poland 1973-1979" in SS vol.32 no.1(Jan. 1980).

Wolnicki, Miron, "Self-Government and Ownership in Poland" in TELOS (Summer 1989).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1987-1988 (Geneva, 1988).

Zloch-Christy, Iliana, DEBT PROBLEM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7).

ECONOMIST "Converting Soviet Arms Factories" (Dec. 15, 1990); "Czechoslovakia's Privatization : Seeking Clean Capital" (Nov. 9, 1991).

WORLD MARXIST REVIEW (March 1989).



- 王思華，《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問題的一些看法》，載《經濟研究》1959年第一期。
- 民主中國陣線，《新年文告》，載《聯合報》，1989年12月30日。
- 列寧，《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大難臨頭，出路何在？》，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 胡平，《八九民運的反思》，載《中國之春》1990年4月、5月、6月、10月及11月號。
-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序言，載《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論》第1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
- 首都鋼鐵公司，《從首鋼看承包制發展趨勢》，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8年8期。
- 陳奎德，《新“太陽城”的殞落——兼論世紀末的左派鄉愁》，載《民主中國》7期（1991年11月）。
- 恩格斯，《致丹尼爾遜》，轉載於羅斯多爾思基，《資本論的創作過程》第2卷（倫敦，1989）。
- 高泉，《聯合報》，1990年2月15日。
-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72）。
- 溫輝，《東歐探索》（香港，1988）：《出路唯民主社會主義》，載《爭鳴》146期（1989年12月）；《論東歐變局》，載《爭鳴》146期（1990年12月）；《東歐革命與中蘇》，載《爭鳴》147期（1990年1月）。
- 萬潤南，《中國時報》，1990年2月9日。
- 楊漫克，《東歐觀潮》，載《中國之春》84期（1990年5月）；《蘇聯：莫斯科聳起民主牆》，載《中國之春》84期（1990年5月）。
- 《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編輯部（編），《建國以來政治經濟學重要問題爭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1）。
- 厲以寧，《改革國家資產管理制度的建議》，載香港《經濟日報》，1989年2月13及14日。

遠志明，《東歐的火能燒到北京嗎?!》，載《聯合報》，1990年1月1日。

駱耕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價值問題》（上海科學出版社，1957）。

劉榮錦，《現行「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一個政治經濟的剖析》，載《共產主義綱領界說二篇》（香港，1987）；《八九民運初步總結與前瞻》，載《四五行動評論》第1期（1989年11月）；《評“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及良性互動論，兼論八九民運的策略得收》，載《四五行動評論》第3期（1991年3月）。

曉亮，《中國所有制結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衛潮（劉榮錦），《評民陣「白皮書」》，載《四五之聲》第1期（1991年6月）。

嚴家其，《展望九十年代的中國》，載《中國時報》，1990年1月1日。

蘇紹智、蕭小明，《從蘇聯東歐變革看中國民運》，載《明報》，1990年1月29日至2月3日。

蘇曉康，《中國時報》，1989年12月30日。



# 蘇東變局圖輯

- 新興幹部階級在匈共政權中的頭號代理人 波茲蓋



- 波蘭總統瓦文薩1992年6月12日晚在格但斯克舉行的「團結」會議上向反對者吹口哨。



- 瓦文薩在波蘭工人群眾前舉起勝利手勢但究竟是那一個階級的勝利？



- 莫斯科示威者要求取消《憲法》第六條。



- 葉利欽——被歷史的邏輯所挑選出來。

- 戈爾巴喬夫在東德「四十」國慶上給昂納克死亡之吻。



- 杜布切克由哈維爾陪同向溫斯洛斯廣場群眾發言，但“人道社會主義”的時代已消逝。



- 哈維爾對於“把家產出賣”感到惆悵。



- 羅馬尼亞軍隊倒戈有政變成份，不能跟俄國革命中士兵所扮演的角色相提並論。

**鳴謝：各友好於工餘協助成書**

---

**包括：唐婉清、黎紹珍、黃鐘、吳萱人**

---

出版者：劉榮錦  
通訊處：九龍中央郵箱72341號  
作者：劉榮錦

版面編輯：吳萱人  
排字：唐婉清  
校對：黃鐘  
助編：黎紹珍  
設計：伊藥  
日期：一九九二年八月初版

開度：大度卅二開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114號廣亞大廈十樓A座 Tel: 8381699

售價：港幣七十元

國際書號：ISBN: 962-7712-01-9

經費贊助：香港專上學聯民主教育基金

---

註冊書籍 · 版權所有

